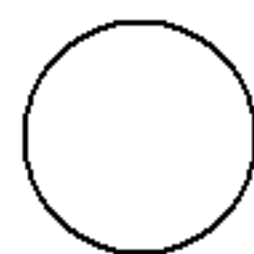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七四年 2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目 录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短评：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 (5)

林彪与孔孟之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8)

铁证如山

——从孔府的罪恶看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洪群 (16)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罗思鼎 (24)

读柳宗元《封建论》.....周一良 (32)

“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倒车.....天津轮胎厂工人评论组 (40)

中庸之道是政治骗子的哲学

.....上海东风线厂工人 沈逸珍 丁佩蓉 (43)

揭穿“人道主义”的骗局

——评苏修叛徒集团尊孔反法的丑剧

.....安徽师范大学学员 刘泽林 朱英武 黄志宏 任学玲 刘奇葆 (45)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

..... 河北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 (50)

打好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 赵忠范 (52)
沈阳部队某部战士

杂文：评万事“无有大于此者”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说明了什么?..... 康立 (55)

抓大事 抓路线 抓政治思想工作

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

..... 田志松 (58)

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岳衡 (63)

勤俭种田 越种越甜

——湖北崇阳县后溪大队的调查报告..... (69)

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洪城 (72)

锄毒草 化肥料

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

——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 《人民日报》评论员 (76)

国际述评：在所谓“能源危机”的背后

..... 常谦 (83)

☆ 二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毛主席语录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语录

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

(短评)

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掀起。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这是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的关键，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努力作战。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就是当前全党的大事，全军的大事，全国人民的大事。不批林批孔，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是放弃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这样下去，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斜路上去。我们必须引起注意和警惕。

为什么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呢？因为林彪同历史上的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他对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五体投地，把它视为信条，奉为经典，贴在和藏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他的反革命言行中，浸透着孔孟的反动思想。林彪尊孔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为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因此，要深入批林就必须批孔，批孔正是为了深入批林。只有通过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正因为这样，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就不是个“学术问题”，也不是象有的人所认为的仅仅是“文化教育界的事，与己无关”；恰恰相反，它是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紧密联系的政治问题，是工、农、商、学、兵、政、党都必须关心的反修防修的大事。这怎么能说“与己无关”呢？“不破不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必须批林批孔。我们不信“中庸之道”，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者，把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打好打胜批林批孔这一仗。

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要着重揭露和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这个阶级的死硬派，他反对变革和进步，坚持复古和倒退。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妄图复辟日益崩溃的奴隶制，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克己复礼”，是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很懂得“克己复礼”的政治含意，对它心领神会。他认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林彪万事中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效法孔子的“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孔子不是说过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吗？林彪正是继承了孔子的这个衣钵，妄图把被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植起来，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贩卖“中庸之道”，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教子尊孔读经，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这就是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还要着重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反动世界观及其根源。孔子为了复辟奴隶制，是以反动的“天命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思想基础的。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就是来自孔子的“天命论”。他胡说自己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把自己比作“天马”，可以在空中“独往独来”。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是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是他妄图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的精神支柱。这也正表现出林彪这个反动派的虚弱性。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天才论”，结合批判孔子的“天命论”，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认识到维护“吃人”制度的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反动性，认识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长期性。



批林批孔，触及到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有一些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如轻视劳动，蔑视妇女，瞧不起工农群众，看不惯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崇洋复古，以及“开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这些除了有它们的社会阶级根源外，都可以从孔孟之道那里找到思想根源。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要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清除这些流毒。

批林批孔必须掌握思想武器，加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许多著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毛主席对于孔孟之道和尊孔思想多次深刻的批判；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都是我们批林批孔的强大思想武器。联系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搞深搞透，真正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论和唯心论、革命和反革命，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批林批孔中的许多有质量的文章、资料和发言，都是作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而产生出来的，要坚持这样做下去。

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是批孔的主力军。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每一次农民革命战争，总是冲击了被反动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他们对孔子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更勇敢、更深刻。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而不可能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彻底战胜孔子的反动思想。这个任务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完成。现在放在我们工农兵肩上批林批孔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继续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孔孟之道批个落花流水，批得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积极投入战斗。“工农兵文化低，不懂古文，批不出水平”，这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对工农兵的污蔑。工农兵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和丰富的斗争知识，在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面，已经涌现出一批敢于和善于斗争的生气勃勃的先进分子，他们必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做出更巨大的贡献！

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带领群众切实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大事，领导干部要做出榜样。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批林批孔中促进和加强广大群众的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们坚信，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有几亿工农兵做坚强的主力军，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林彪与孔孟之道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倡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



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总之，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林彪也是搞复辟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和政治需要，所以林彪紧紧抓住“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他搞反革命政变和《“571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内容的最好说明。

林彪的“复礼”，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诬蔑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制造矛盾”；他们竭力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肆诽谤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描绘成漆黑一团。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的“礼”。他们和孔子一样，都是颂古非今、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

林彪的“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在写下“克己复礼”条幅的同时，还学着孟子的腔调，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请看：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

一九七〇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集团“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在我国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内，他们照搬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



动，猖狂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到那时，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惨死在他们的反革命屠刀之下，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国际上，他们按照自己的座右铭——孟子的“小国师大国”行事，进行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林彪这个“超级间谍”的阴谋得逞，我国锦绣河山就会遭到苏修坦克的蹂躏，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就会在我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

总之，林彪捡起孔子“克己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切，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本来想打着苏修主子的“核保护伞”，登上儿皇帝的宝座，结果却葬身沙漠，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到孔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有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它服务的反革命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孔孟的反动哲学。他用孔子的天命论、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用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用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动了全面进攻。

孔子鼓吹“天命”，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作“天”老爷，他生育万物和人，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周文王等奴隶主所以有权统治人民，就是因为受命于天，而周公和孔子本人所以有“德”成为“圣人”来“教化”人民，也是因为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一种为了维护奴隶主专政而制造出



来的宗教神学的唯心理论。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从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引伸出来的。林彪为了篡权复辟，把孔子的这一套唯心论当作宝贝。他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自比天马，把自己说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象龙一样的神人、超人和天才。他还在给其死党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这同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岂不完全是一路货色！多年来林彪及其死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谣言和诡辩把天才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他亲手写的“受于天”三个字，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孔子天命论的翻版，他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这就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反对辩证法的真面目。孔孟所谓的中庸，就是做什么都要合于“礼”，既不过度又无不及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作“庸”。一句话，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丝毫偏离和改变，就是中庸之道。这完全是反动阶级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对于这种东西，林彪赞不绝口，说是“合理”。按照这种“理”，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好家伙，一大堆帽子扣上来。其实，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恰恰说明了林彪所坚持的，是一条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妄想开倒车的极右路线。林彪的所谓“过分”，就是用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毛主席早就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林彪说“乱了套”，无非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一套，不乱这一套，就不能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怕乱你们这一套吗？这才刚开始，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差得远呢。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是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还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林彪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辩证法，正是他搞极右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林彪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原则，并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性来讲什么“仁爱之心”，抹煞阶级对立来讲什么“人的关系”，



这就是拿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篡改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

儒家所宣扬的人性论，是一种虚伪的唯心主义理论，它总是宣扬一种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孔子宣扬什么“仁”就是“爱人”，孟子说“仁心”是人生来就有的，“人性善”。他们果真不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郑国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孔子不是表扬他们干得好，赞为“善哉”吗？孟子不是专门论证对奴隶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和统治是“天下之通义”吗？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也是一点不爱的。孔子在鲁国代行宰相，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事，孔子就马上开除他的学籍，断绝师徒关系，还要煽动学生攻他。这就说明孔孟讲的什么不分阶级的“人类之爱”，什么天生的“仁心”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剥削阶级中的奴隶主那一小撮，只是那个反动的奴隶制度。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要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要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统统打下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林彪的“人性”，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说：“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货色，是一种绝好的说明。

反动阶级拼命宣扬人性论，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关心人民的“仁义之主”，掩盖自己的吃人真相。另一方面，则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向先进阶级的革命暴力兴师问罪。孔子不是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为乱”，骂造反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为盗”吗？孟子更是这样，他破口大骂革命暴力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是“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应当处以极刑。林彪完全承袭了孔孟的一套，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猖狂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做，我们就要亡国，地主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在林彪的假仁假义后面，难道不就是要用反革命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暴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



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玩弄儒家权术，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要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拼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林彪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挖空心思从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以至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总结的一套反动统治术和两面派的伎俩，都成了他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重要思想武器。

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处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准则，林彪在反党集团内部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林彪的“君使臣以礼”，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林彪明明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却偏要唱起“使臣以礼”的腔调，打出“求贤”的招牌。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一句话，就是用名利地位收买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服务。当他的死党的狐狸尾巴被群众揪住时，他便利用职权，包庇保护，使其蒙混过关。他的所谓“求贤”，就是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

林彪标榜“君使臣以礼”的真实意图，是要他的死党“臣事君以忠”。象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林彪也把“忠君”思想作为维持其反革命队伍内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宣扬孔孟“敬上”、“无违”的“忠孝”之道，提倡绝对服从；他强迫其特务组织成员向林家父子宣誓效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当林彪反党集团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令，妄想要其反革命“舰队”成员为“林家王朝”殉葬。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

林彪十分欣赏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它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林彪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忍耐”，切勿因“匹夫之勇”



而败坏了“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在“忍”的背后，林彪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实际上是胡风“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林彪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一九七〇年三月，正当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林彪指使他的死党把“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上赞扬刘备用“韬晦之计”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虎穴”，自比为暂时栖身于“虎穴”中的“英雄”。这就不仅暴露了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时也暴露了林彪用两面派手段乔装打扮，把反革命真相掩饰起来，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毒手的狰狞面目。

为了伪装掩饰自己，“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又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暗地里制定了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这一切，无须多加一字，就活灵活现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人们会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之流尊孔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首先，林彪之流的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



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产儿，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在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

其次，从历史根源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深日久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大讲孔孟之道，这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不批孔，不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实质上就是不批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铁 证 如 山

——从孔府的罪恶看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

洪 群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尊孔反法，把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为了用事实揭露孔孟之道的反动性，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我们对孔府的累累罪恶进行了调查。

曲阜是孔子的家乡。孔府是孔子后裔居住的地方，座落在曲阜县城。历代反动统治者，为了利用孔子维持其统治，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孔子嫡系后代，从政治上、经济上予以特别“眷顾”。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建帝王赐给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以世袭“衍圣公”的封号，所以孔府过去称为“衍圣公府”。它是一个庞大的贵族地主庄园，是一个拥有官员和种种司法特权的世袭“小朝廷”。这个“衍圣公府”，完全继承了他们老祖宗孔子的衣钵，口头上高唱“仁义道德”，实际上却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铁的史实，充分揭露了林彪所吹捧的孔老二所宣扬的一套“道理”，就是剥削之道、吃人之道；所谓“德”、“仁义”、“忠恕”，不过是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维护和巩固其剥削阶级统治地位的反动精神支柱。

所谓“仁政”、“德治”，就是对 劳动人民实行镇压和屠杀

孔老二的高足弟子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复礼”四个字，就是反动孔学的核心，就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一伙找到这四个字，如获至宝，大书特书，互相赠答，置之枕边座右，把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孔子是爱讲“仁”、“德”、“爱人”的。比如，什么“为政以德”呀，什么“仁”



是“爱人”呀，等等，真是说得天花乱坠。林彪和历代反动派一样，都极力吹捧孔子的所谓“仁义道德”。他们为了利用孔老二这具僵尸为其罪恶行为辩护，便把孔子一抬再抬。孔子于汉平帝元始元年被封为“褒成宣尼公”，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被封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被封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被封为“至圣先师”，清世祖顺治二年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蒋介石也吹捧孔子为“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不管反动统治阶级和林彪一伙给孔子戴上多少桂冠，都遮盖不了他那副伪君子的嘴脸。他主张镇压奴隶起义，对于主张革新的人深恶痛绝。他在鲁国代行宰相之职才七天，就杀掉了当时的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所谓仁政也好，德治也罢，都不过是骗人的东西。他的“仁”和“德”是施于奴隶主的，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从来都是缺德无仁，有的只是血腥的残害和屠杀。

林彪胡说“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们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吹捧为“人类美德”、“极高的美德”。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所谓“文章道德圣人家”的“衍圣公府”里，对劳动人民实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仁政、德治吧。

“衍圣公府”内设有公堂：大堂，二堂，三堂。据“孔府档案”的一些记载来看，凡孔氏族人和孔府佃户、庙户、仆役等犯了“法”，“衍圣公府”可以自行传讯或断结。红签一投就可以随便抓人，绿签一拔就可以任意打人。孔府内还备有恫吓劳动人民的金瓜、钺斧、牙棍、蛇枪、鬼头刀等仪仗和用来摧残劳动人民的皮鞭、黑红棍、锅拍枷、铁锁链等刑具。过去孔府还向人宣称，皇帝赐给“衍圣公”虎尾棍、雁翅镜和金头玉棍，用它打死人可以不偿命。

“衍圣公府”为了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还建立了一整套政治机构和管理系统。内部设有六大厅，即：知印厅、掌书厅、百户厅、管勾厅、典籍厅、司乐厅。其中管勾厅主管收租，下设“管勾衙门”。百户厅掌管林庙守卫，不设“百户衙门”。此外，还有圣庙执事官四十名（从九品到三品），属员几百名。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孔府还组织有“奉卫队”。

封建王朝还赐给“衍圣公”许多特权。他可以卖官鬻爵，封建王朝给他四十个官位，由其任意出卖。他可以控制曲阜知县，曲阜知县从唐开始常由“文宣公”（“衍圣公”的前封号）、“衍圣公”们兼任，明代改为孔氏世职，到清乾隆时虽然改为“不必拘用孔氏族人”，可“在外拣选调补”，但还须在“衍圣公”的严格控制之下。另外，他还可以对地方官吏发号施令。



“衍圣公府”倚仗封建王朝给予的种种特权，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迫害，它实际上是一个挂着“文章道德圣人家”招牌的凶残衙门。“衍圣公”们把孔庙、孔林、孔子出生地尼山和埋葬孔老二他爹的防山，说成是圣地、“圣脉所在”，任何人不准侵犯，如有违者，轻则罚，重则处死。一九一二年春天，曲阜林前村孔昭贞为饥寒所迫，不得已到孔林砍了一点树枝，就被孔府爪牙抓住打了个半死。送往县衙门后，县官奉了“衍圣公”的旨意，给孔昭贞戴上五、六十斤重的锅拍枷，牵着他在孔林四周和附近村庄游街示众。每天游一次，一直游了三个多月。孔昭贞的腰被压弯了，最后致成重残。曲阜鲁源村贫农孔继成于一八九四年的一天，在离尼山半里多远的自己地里挖出了一块石头，孔府便以破坏孔家风水的罪名，将他毒打关押了半年多，逼得他家里把仅有的五亩祖业地全卖了，又卖儿卖女，最后才把人赎出来。这说明孔子主张的“仁政”、“德治”，只不过是他们对劳动人民实施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的一块遮羞布。在它的背后掩盖着的，是反革命刽子手的凶相。

孔子的后代“衍圣公”们，遵照他老祖宗反对“犯上作乱”的旨意，勾结封建官府，对农民起义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他们打着守卫祖宗祠庙的招牌，强迫劳动人民为他们筑寨圩，挖城壕，建围墙。同时，他们还通过各地的爪牙，训练壮丁，招募乡勇，镇压起义农民。农民一旦揭竿而起，他们就向官府通风报信，资助粮饷，请求援兵，或组织反动武装配合官府屠杀起义的农民。

据“孔府档案”记载，一七二一年一月，泗水县盐民起义，“衍圣公府”立即请清政府派骑兵、步兵驻守曲阜，并调驻守台庄营的清兵去泗水镇压。他们对起义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起义军首领孔振公不幸被捕，押至长清县横加迫害。孔振公威武不屈，绝食反抗，最后壮烈牺牲。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义时，“衍圣公”也急忙给户部咨文，捐银三千两，接济清政府对太平军大肆屠杀。一八五三年，以宋继朋为首在邹县组织白莲教，一八六〇年，正式举起义旗。年底孔府密报山东巡抚。山东巡抚得信后，立即调兵前往镇压。一八六三年，杀人刽子手僧格林沁亲率大军围攻教军根据地，宋继朋牺牲。据邹县《掩埋白莲池尸骨记》碑文载：这次镇压后，只见“白骨累累，如山堆积”，尸首“除废肢断骨不计外，其可数者二万余具”。又据邹县《平定白莲池教匪掩埋枯骨碑记》载：几年后，乡人又在“高山峻岭，悬崖峭壁，以及井窖沟渠等处”，“搜寻遗骨一万余付”。仅明清两代，孔府就伙同反动政府先后镇压过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多次。

“衍圣公府”还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串通一气，血腥屠杀革命人民。据南泉村贫下中农控诉：抗战初期，日寇进入曲阜后，孔府大摆宴席，欢迎



日寇，并把他们安插到对孔府反抗最激烈的南泉村。日寇在村中无恶不作，把全村一百七十多户群众的家产全部毁掉。一九四六年曲阜第一次解放，彭希志当了民兵自卫团团长，领导群众斗争了孔府的总管家孔霁光。但当我解放军暂时撤离曲阜后，孔府就勾结还乡团头子韩小眼等，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彭希志被捕后，遭受了种种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向敌人低头，最后壮烈牺牲。被杀害的还有村妇救会长李玉桂、农会委员王景喜、财粮干事孔庆合等许多革命同志。

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说明，孔子和他的后裔“衍圣公”们，以及林彪等一切反动派，嘴巴上整天挂着“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用鞭子、刑棍、屠刀、枪炮去残害劳动人民。就在这仁政、德治的招牌下，淌尽了人民的血泪，堆起了人民的白骨，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们的仁政、德治就是暴政、屠杀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也必须对一切反动阶级实行专政，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但是，林彪一伙却拚命从孔学这个破烂的思想武库中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毛主席对反动派的这类攻击和叫骂，早就作了批判：“**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充分说明了林彪是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刽子手，是革命人民凶恶的敌人。我们对他们就是不施仁政。

所谓“富民”、“利民”，就是杀民、害民

孔老二梦寐以求的是要复辟奴隶制度，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他嘴上却说什么，人口多了，再“富之”，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叛徒、卖国贼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把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他攻击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富民穷”，嘴上也就假惺惺地唱着孔老二的“富民”、“利民”的滥调。

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孔子本人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却过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他一方面娓娓动听地说要“富民”、“利民”，另一方面却又要劳动人民“贫而无怨”，甘受剥削阶级的奴役和压迫。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所鼓吹的“富民”、“利民”完全是一套骗人的把戏。事实也正是如此。



只要我们看一看继承祖训的“衍圣公”们在经济上是怎样对劳动人民实行敲骨吸髓的残酷剥削，就可看出孔子主张的“富民”、“利民”到底富的是哪家的“民”，利的又是哪个阶级了。孔府的罪恶史，劳动人民的血泪仇，就是对孔子“富民”、“利民”的最好揭露，也是对林彪之流鼓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

毛主席说：“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事实正是这样。“衍圣公府”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最长的地主庄园。“衍圣公府”最盛时期，所霸占的土地多达一百万亩，遍及鲁、冀、豫、苏、皖五省，仅在山东就有五屯、西厂、十八官庄。据曲阜红庙村的调查，解放前，全村二千二百五十亩土地中，孔府就占有一千四百四十五亩，再除去本村地主、富农占有六百七十亩，广大贫下中农却只有一百三十五亩，仅占全部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六。

孔府这些土地从哪里来的？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其掠夺手法：一是历代封建王朝的赏赐，即假封建皇帝之手进行掠夺；二是趁农民破产之危，变相掠夺和兼并；三是以办学堂和祭祀孔老二为名，假手地方官吏霸占；四是孔府直接强行圈占。据“孔府档案”记载：清咸丰年间，孔府借清查祀田为名，说江苏沛县等地，有元代钦拨祀田九十顷，派平阳屯屯官唐守忠“率众数千人蜂拥沛境”，“遍插圣公府三字旗帜”，“灭没庄村百余处”，竟占地“三千二百余顷”，超过孔府原称地数的三十五倍多。只是因为强占过多，影响封建国家的剥削收入，最后封建政府没有认可这么多。

孔府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方式多种多样，手段极为毒辣。

第一种剥削方式，是地租。孔府的土地名目很多，有私田、祀田、汤沐地、脂粉地等。在这些土地中，有的收租粮，有的收银子。地租剥削量达百分之五、六十。但由于孔府敲诈勒索的手法极多，其实际剥削量大大超过上述数字。

佃户向孔府交租时，除正额地租外，还要受许多额外剥削。孔府的佃户们悲愤地说：“那时向孔府交租，过一道门坎就剥一层皮”。第一道门坎是验租。佃户的租粮一送到，小甲（催租头目）便要挖出一升粮食检验粮色，挖出的这升粮食不再倒回，硬被小甲占有。以后成为惯例，佃户每次交租，都要先提出一升给小甲，名曰“验升粮”（也称“合子粮”）。有时小甲以验粮色为名，还要先用风车扇，一扇就去一大堆，全归他们所有。第二道门坎是“量租”。孔府在量租时还有一种特殊的剥削方法，就是“斗尖”和“地皮”。量租时，倒满了还要倒，一直倒出尖来，流到地下。流到地下的粮食叫“地皮”，归仓头（农民称他们为“仓老鼠”）；尖出来的粮食叫“斗尖”，用一把木刀刮下来，单收起来归管事的。最后一道门坎是



入仓。入仓得向仓头送钱说好话，要不就得吃气。真是：“进了孔府步步难，步步血泪步步冤”。

第二种剥削方式，是强迫农民“纳贡”和服役。孔府为了满足其腐朽生活的需要，还指派一部分农民为其额外“纳贡”和无偿服役。有专门为孔府提供食用的粉条户、豆芽户、香椿户、桃户、杏户、年菜户、鸭蛋户、鱼户、菱米户等；有专供孔府生活享用的盘子户、碟子户、炊帚户、笤帚户、檀香户、年花户、花炮户、门神户、屠户、船户等；还有专供孔府婚丧祭祀使唤的喇叭户、点炮户、杠子户、盒子户、猪户、羊户、祭牛户、祭羊户、洒扫户等。在孔府的户人中，还有一种叫做嚎丧户。“衍圣公”家死了人，自家人不哭，强迫嚎丧户替他们哭。孔府可以硬行指派户人，一经指定为户人，便要听候使唤，没有人身自由，而且要世代承袭下去。

为孔府服役的农民，受尽了人身摧残。据曲阜县齐王官庄老贫农赵凤玉说：有一年旧历腊月二十七，他替孔府往北京皇帝那里送礼物，两人一辆二把手车，从曲阜到北京一千二百多里路，来回得走一个多月，可是盘缠只发给十八天的。路远载重，腿肿得象瓦罐一样。肩膀被磨烂了，车祥、衣服和皮肉粘在一起，揭都揭不下来，晚上睡觉只好让车祥带在肩头上，最后落了残疾。

第三种剥削方式，是额外加派和强迫送礼。孔府倚仗权势，额外向农民征收财物。据“孔府档案”记载，孔府每年都要向农民额外征收什么“年例”银、“年例”棉、“年例”布、“年鸡”和“年猪”。总之，孔府里的过年度节、婚丧嫁娶、生孩子、过寿日等，都是农民们的祸事，征财敛物，不一而足。

第四种剥削方式，是放高利贷。孔府的高利贷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开办钱庄。打着兑换银钱，便利乡民的幌子，从中牟利。农民兑换一吊，只给八百。二是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粮。春借一斗，麦后还二斗。三是借种粮。佃户无种，孔府垫支，收下粮食后加倍偿还。四是放牛租。买牛一头，用银八两，租给佃户时却作银十一两，限三年还清。

第五种剥削方式，是霸占集市，收取税银。孔府除霸占了屯集二十二个外，还霸占了许许多多的义集。

此外，孔府还利用封建帝王赐给的权力卖官鬻爵，大发横财。而出钱买官的都是地主豪绅，他们买官用的钱，归根到底还是从劳动人民身上搜刮来的。

以上仅是孔府的几种主要的剥削方式。而当时的劳动人民，又是过着怎样的悲惨生活呢？据“孔府档案”记载，顺治十七年，独山屯佃户马朝会等控诉孔府说：“去岁催征，屯户无奈，有破家罄产者，有货男卖女者，情极难堪。”又据红庙村的调查，当时全村一百一十户，有九十多户给孔府当佃户，过着“破屋露着天，



破衣露着皮，破锅漏了底”的悲惨生活。一九二七年遭灾，几乎颗粒未收，而孔府的租粮，却少一粒也要治罪。因此，全村有八十五户外出逃荒要饭，三十多户共卖了六十多个孩子，饿死七十多人，有十二户全家死绝。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户膏”。看吧！这些就是“衍圣公”们在他们老祖宗的“富民”、“利民”的说教下，对劳动人民进行种种奴役剥削的滔天大罪。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孔子主张的“富民”、“利民”就是杀民、害民吗？

孔子的“富民”、“利民”主张，是他的治国方案之一，有着鲜明的阶级倾向。正如鲁迅在批判孔子时所指出的那样：“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孔子“富民”、“利民”的阶级内容和它的反动实质。

今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妄图在孔学“富民”、“利民”词句的打扮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剥掉他伪装的画皮，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所要“富”的是一小撮被打倒了的的地主、资本家，所要“利”的是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就是说，他们要叫劳动人民重新过牛马不如的生活，重新受地主资产阶级和“衍圣公府”的剥削、奴役和压迫。我们要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戳穿孔子和林彪之流的谎言。

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为剥削阶级的 反动统治培养接班人

教育问题，说到底是为哪个阶级培养人材、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教育都是阶级的教育。孔老二办教育，是为奴隶主贵族培养人材，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反革命两面派林彪，教子尊孔读经，“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是为了建立林家世袭封建法西斯王朝，阶级性都是十分鲜明的。

孔老二说：“有教无类”。反动统治者一直大肆吹嘘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是什么不分阶级招收学生，把孔子打扮成“全民教育家”，这完全是欺人之谈。有的同志已经揭穿了“有教无类”的原意是主张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的一种反动手段。事实上，孔子一贯仇视劳动人民，他的学生樊迟“请学稼”，被他骂为“小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学而优则仕”，学的目的是要去做官的。他所培养的弟子，自然都是贵族和奴隶主的子孙，不可能有劳动人民。就是那个“在陋巷”“不改其乐”的颜回，也是“世世仕鲁为卿士”的贵族子弟，“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饘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线麻。”孔子办的学堂，有个招生条件，就是至



少要交十条干肉的学费，才可做他的学生。在当时，奴隶哪里能交得出十条干肉呢？从孔子后代继承祖训办起的四氏学（孔颜孟曾四氏学）来看，入学的也仅限于地主富商的公子少爷，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是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大门的。

在解放前的漫长岁月里，曲阜县就出现了“圣人门前文盲多”的现象。据统计，一九四六年，全县只有小学八十四所，在校学生仅四千人。中学两所，在校学生仅五百人，还不都是本县人。全部入学人数还占不到全县总人数的百分之二。这些学生中，又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等剥削者的子弟。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奇怪，正是孔老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反动谬论造成的恶果。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县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发展更快。到一九七三年，全县有小学四百一十一所，在校学生达七万七千四百三十四人，中学五十七所，在校学生达一万八千一百零一人。这说明，“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孔氏封建堡垒中的四氏学，是历代王朝用来为其培养大批奴才的学校。四氏学教规中说：“养成贤材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在清代，它的教授、学录常由七、八品官吏充任。在科举方面，省试举人，如果填榜时没有姓孔的，便不能开榜，这就是所谓的“无孔不开榜”。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中，曲阜县中进士的共有四十四名，其中四氏学的学生占三十三名。在嘉庆和光绪之间，曲阜县选为翰林的八名进士中，有四氏学的学生七名。这些人分别做了知县、知府、按察使和员外郎，成为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四氏学于一九二四年改为明德中学后，继续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培养有文化的奴才。

从孔子教学的实践和孔府办学的目的和历史，都清楚地说明：“学而优则仕”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一切剥削阶级都要为本阶级培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官僚，因此他们都极力鼓吹“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教育思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提出的“读书做官论”，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都是“学而优则仕”的翻版。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方针，彻底划清了无产阶级教育同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界限，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规定了明确的目标，这是确保无产阶级政权永不变色的一项根本大计。我们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林彪一类骗子所吹捧的孔孟之道和散布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毒素彻底扫除干净，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占领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

——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罗 思 鼎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命孔门正统的道学家们的眼中钉。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所奉为至宝，并用以作为他搞阴谋、搞政变的立论根据的那篇托名伪造的《辨奸论》，就是当时道学家对王安石进行造谣、诬蔑和中伤的一篇代表作。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以下简称《考略》)。这是一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护的著作。它驳斥了宋朝以来道学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为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论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结合批林批孔来研究封建社会的这场儒法论战，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有助于我们揭露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儒、法两种思想斗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自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法家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学派，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法家学派从汉代以后虽日趋消沉，但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搞革新的政治家，如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往往从提倡变革的先秦法家学派中寻找思想武器。因此，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往往以儒法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宋代，它直接反映为“荆公新学”和反动理学的对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谓“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后，为了替推行新法制造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而创立的一个新学派。有进步必有反动。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这一政治派别的思想代表程颢、程颐在反对新学的斗争中，发展了反动的孔学，形成了极端唯心主义的理学即道学。这场新学与理学的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北宋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都是极端的尊儒反法派。他们把同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捍卫孔孟道统的斗争。《考略》指出，顽固派异口同声地攻击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①，是少正卯那样的革新派。道学家程颢兄弟首先跳出来攻击新学，惊呼“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按：王安石字介甫)，“坏了后生学者”^②，表示要同它拚命。司马光的喽罗吕海攻击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③。范纯仁大骂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④。南宋以后，道学家朱熹等人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嚷王安石“学本出于刑名度数”^⑤(意指王安石的学问都是以法家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如果落在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⑥。这些孔门之徒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是要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本阶级内部的革新派的。林彪这个孔老二门徒，一面假惺惺地讲什么“和为贵”，咒骂法家是“罚家”，同时大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政变，也正是继承了孔子这个“巧伪人”的一套手段。

地主阶级顽固派以保卫孔子自居，斥责王安石的新学崇尚法家思想，是违背儒家正统的异端邪说，从反面说出了事物的真相。王安石在当时确实是一位有尊法反儒倾向的人物。变法期间，他把“先儒传註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⑦，代之以自己撰述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用来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顽固派骂他是商鞅，他针锋相对地回答：“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⑧他嘲笑汉儒的烦琐哲学是坑害人的“无补之学”^⑨，骂他们是区区修补，百孔千疮。至于对那些“据经泥古”的儒生，则抱着极其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⑩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⑪（“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去顾虑”）这三句话，和孔子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⑫（“对天命要畏敬，对王公大人要畏敬，对圣人的言论要畏敬”）直接相对立。这一下，在当时死



水一潭的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死守儒家反动传统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司马光竭力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⑬。文彦博也跟着喊叫：“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⑭。王安石则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⑮他在《兼并》诗中愤慨指出：“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顽固守旧的俗儒是大地主兼并势力的走狗，是变法的凶恶敌人。

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宋代在变法开始前，一小撮大地主霸占了全国十分之七以上的土地，广大农民日益赤贫化，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大批破产，造成了“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⑰的严重局面。这种状况既促进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又进一步缩小了赋税的来源，引起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一上台，就提出了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他一再说：“理财为方今先急”^⑱；“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⑲。办法呢？“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⑳。他特别推崇汉朝著名法家桑弘羊坚持推行的“建本抑末”、“绝兼并之路”^㉑的法家经济政策，认为“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㉒。这就是要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来重新调整权力和财产。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㉓。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破坏。他们口口声声攻击王安石变法“用贱陵贵，以邪妨正”^㉔，“夺富民之利”^㉕，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㉖。当时司马光身居洛阳，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亲自指挥顽固派的捣乱活动，发誓要推翻新法。苏轼、苏辙兄弟之流，则是典型的投机派。他们有一套适应形势的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原来是恪信儒家信条的孔孟之徒，但在变法舆论高涨期间，也大唱起“常患法之不变”^㉗的调头。等到逆流一来，他们就马上把脸一变，落井下石，攻击王安石“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㉘（“使老百姓只知道财利而不懂得仁义，只看到刑罚而看不到道德”）。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的。他们提出抑制兼并，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并不可能改善



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变法派内部，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真正态度坚决的只是极少数。其中有的人根本就是投机分子。有个叫邓绾的，就是为了过官瘾而附和变法的，当别人斥责他时，他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②宋朝的社会危机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王安石由于其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幻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修补补，走改良的道路，这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他的法家思想也是不彻底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至于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则比他的理论更要软弱，时停时续，时松时紧，从来也没有被认真实行过。后来，顽固派司马光上台执政，推翻了一切变法措施，竭力鼓吹儒家的反动理论，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

反动的道学家们企图把北宋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说什么“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③。事实上，北宋王朝的灭亡，正如蔡上翔《考略》中所指出的，完全是“苟且因循不振之故”^④（“苟且偷生、因循守旧而不知奋发图强的原因”）。换句话说，北宋的覆亡恰恰是由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守旧的路线造成的，是理学家们造成的。鲁迅说得对：“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

林彪跟着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屁股后面，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用以咒骂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咒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正暴露出林彪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果然，林彪投奔苏修，自我爆炸，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卖国贼。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粉碎内外敌人阴谋的斗争中，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欣欣向荣，继续胜利前进。

二

要正确认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根源和蔡上翔在《考略》中为王安石辩诬的意义，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法论争的全过程。

秦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



基础上的。他们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因此，整个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趋势，是儒家学派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而法家学派却越来越受排斥和咒骂。秦始皇是公开提倡法家思想的，“焚书坑儒”就是对先秦儒法斗争的一次革命性总结。在汉代，汉武帝虽然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学封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⑧。

孔子在思想界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逐步向反面转化为反动派的过程一致的。汉武帝以后，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历代都有人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桑弘羊就痛骂孔子是一个反动政客，直率地斥责孔子和他的学生“不耕而学，乱乃愈滋”^⑨。东汉的桓谭“非圣无法”^⑩，对待孔子也有点不太尊敬。王充则专门写了《问孔篇》，揭露孔子的说教“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直言不讳地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⑪西晋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⑫，结果为了这桩罪名而丢了脑袋，可见这时的孔圣人已经是不能随便得罪的了。到了唐代，孔子被抬上了“文宣王”的宝座，连唐玄宗这个风流皇帝也哼起了“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⑬的调子。但就在这时，用大不敬的态度直呼孔老二名字的也还大有人在。李白自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⑭，对孔圣人有点油腔滑调，很不礼貌。直到唐代后期，韩愈大谈特谈孔孟的“道统”，说什么“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⑮，孔子才开始被看作神圣不可触犯的偶像。但就是韩愈这个铁杆尊孔分子，有时也还难免要与孔圣人开个小玩笑。《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搯星宿遗羲娥”，就是在讽刺孔子不到秦国，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向后期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转折点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清代李慈铭说：“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⑯。李慈铭的立场是反动的，但他认为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封建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和僵化，这个意见却是不错的。蔡上翔在《考略》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地主阶级一天天走向下坡路，孔子的地位也被封建统治者越抬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反动的程朱理学由于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思想。这



些道学家们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不择手段地对王安石及其新学进行攻击和歪曲，正如《考略》所指出的，“种种阴谋诡秘，有同鬼域”^{④①}。《考略》揭露了《辨奸论》是南宋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成的一篇造谣作品，它胡诌一通“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鬼话^{④②}，目的是为了攻击王安石是“阴贼险狠，与人异趣”^{④③}的大奸大恶。这个邵伯温还捏造说，他的老子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就预见到政治将发生变乱，十年之后，果然发生了王安石变法。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早在清代初年，李绂就已指出：《辨奸论》“无端造谤”，“诬枉而失实”^{④④}。蔡上翔更进一步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但是，《辨奸论》这种卑鄙无耻的造谣手段，却受到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赏识。他以伪《辨奸论》为理论根据，捕风捉影地罗列一堆现象，大谈“政变”经，用什么“见微而知著”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妄图为其篡党篡政的阴谋服务。这充分说明林彪同历史上那些反动道学家一样虚伪无耻，只能靠搞唯心论，散布谣言，玩弄阴谋诡计过日子。林彪欣赏《辨奸论》，就是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后来集中表现在见不得阳光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林彪所特别崇拜的一个南宋反动道学家。就是这个朱熹，编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把以前攻击王安石的一切反动言论统统收集了起来，流毒极深。蔡上翔指出：“安石得谤于天下后世，固结而不可解者，尤莫甚于《言行录》。”^{④⑤}自从这部书问世以来，王安石受到了更恶毒的谩骂和污蔑。有人甚至捏造说，阎罗王新造了一个“变古狱”^{④⑥}，又说地狱中有个“被械白鬚”的人，“乃王安石介甫”^{④⑦}。明代有个叫周德恭的反动理学家竟大骂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④⑧}。到了清代，钱大昕咬牙切齿地攻击王安石“得罪于名教”，是“狂惑丧心之大恶”^{④⑨}。这种极端嫉视和害怕任何改革的心理，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和崩溃了。

在地主阶级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的过程中，尊法反儒思潮的总趋势只能是一浪低于一浪。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儒法论争表现为法家节节胜利和儒家步步败退。在西汉前期，儒法两派在思想界也还保持着“两刃相割，利钝乃知”^{⑤⑩}的对垒局面。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是一场儒法的大论战，斗争的结果是法家桑弘羊的失败和遇害。此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法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却继续被地主阶级中的进步思想家所接受。这时的儒法



论争，主要表现为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的斗争。王安石是有法家倾向的，但已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法家；他批判了孔子的反动论点，但不敢指名道姓批判孔子。在他以后，不少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形式下冲击了孔孟之道，但却往往又抬出了孔子来作为护法神，竭力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孔子之徒。黄宗羲反程朱，不反孔孟，还借用儒家的“三代之法”来反对“一家之法”的专制统治。戴震袭用了王安石的经注形式对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们都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也不敢公开批判孔子。其中有些人反对了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却又陷入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中。清代乾嘉学派中的不少人刚跳出了宋代理学的圈子，又陷进了汉儒烦琐考据的泥坑。蔡上翔同样也不例外。他在《考略》一书中肯定了王安石变法，同时却又想竭力证明王安石的思想是合乎“真孔孟之道”^①的。上述事实说明，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也已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们回顾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尊儒是为了维护或复辟其反动统治，反法是为了反对进步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尊孔，刘少奇、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起尊儒反法的黑旗，就是为了妄图在我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实质，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我们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批判儒家的反动性，目的“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同时，这也是为了揭露和批判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怎样利用历史上的反动思潮和反动学派向无产阶级进攻，以便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必须深入批林批孔，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全面专政而努力奋斗！

注：

①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七第一一六页

② 程颢、程颐：《二程全书·遗书二上》（四部备要本第二〇页）

③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四第二〇四页

④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⑤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一第三九四页

⑥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九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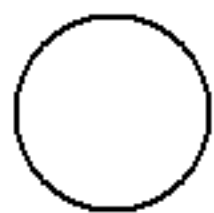
⑦ 《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六



- 一页) :
- ⑧ 王安石: 诗《商鞅》, 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二第三五五页
- ⑨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第一〇二页
- ⑩ 《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五九页)
- ⑪ 《宋史·王安石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六一页)
- ⑫ 《论语·季氏》
- ⑬ 《宋史·司马光传》(四部备要本第二八一九页)
- ⑭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二一第三页
- ⑮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节要附存卷二第四三四页
- ⑯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四第七四页
- ⑰ 王安石:《风俗》, 见《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第七三八页
- ⑱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第一五页
- ⑲ 王安石:《答曾公立书》, 见《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第七七三页
- ⑳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八第一二九页
- ㉑ 《盐铁论·复古》
- ㉒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 ㉓ 《宋史·职官志》(四部备要本第一一九一页)
- ㉔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第九页
- ㉕ 苏轼:《诗病五事》, 见《栳城集》三集卷八(四部备要本第六三六页)
- ㉖ 司马光:《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劄子》, 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第九页
- ㉗ 陈亮:《铨选资格》, 见《龙川文集》卷一一第一一六页
- ㉘ 苏轼:《上神宗皇帝万言书》, 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四第二页
- ㉙ 《宋史·邓绾传》(四部备要本第二七七五页)
- ㉚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八页
- ㉛ 蔡上翔:《读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六第一一二页
- ㉜ 《汉书·元帝纪》
- ㉝ 《盐铁论·相刺》
- ㉞ 《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 ㉟ 《论衡·问孔篇》
- ㊱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三二二页
- ㊲ 唐玄宗:《经鲁祭孔子而叹之》, 见《唐诗三百首》
- ㊳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见《李白诗选》第二六八页
- ㊴ 韩愈: 诗《荐士》, 见《韩昌黎全集》卷二
- ㊵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九九三页
- ㊶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〇第一五六页
- ㊷ ㊸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〇第一五〇页
- ㊹ 李绂:《书邵氏闻见录后》, 见《穆堂初稿》卷四五第二八页
- ㊺ 《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六页
- ㊻ 洪迈:《夷坚乙志》卷一第三页
- ㊼ 吴开:《漫堂随笔》, 见《说郛》卷六四
- ㊽ 见《王荆公年谱考略》杂录卷二第三五八页
- ㊾ 钱大昕:《王安石狂妄》, 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七
- ㊿ 《论衡·案书》
- ①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九第一四二页



读柳宗元《封建论》



周一良

历代评论秦始皇的文章，咒骂者居多，只有极少数人肯定他的成就。在正确评价秦始皇的文章中，唐代柳宗元（公元七七三——八一九年）的《封建论》是杰出的一篇。《封建论》肯定秦朝废除分封，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进步意义，指出这种措施对于维护统一，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必要性，从而正确估计了秦始皇革新进取的历史作用。柳宗元在议论历史的同时，还联系当时的政治局势发表了意见，使自己的史论为政治服务。《封建论》是值得认真读一读的一篇好文章。

秦始皇尊崇法家学说，反对儒家孔孟之道。他的目标，是防止已经崩溃的奴隶制复辟，维护和巩固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进步意义的封建地主制。秦朝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废除西周以来奴隶制社会分封诸侯的办法，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官爵不再世袭，一切赏罚以对于封建地主国家的功过为标准。秦朝统一以后，全国车同轨，书同文，度量衡也划一起来。对于反对这些措施，妄图恢复战国分封割据局面，梦想开倒车回到奴隶制社会的儒生，和他们制造这种舆论的书籍，秦始皇采取了坚决镇压手段——焚书坑儒。作为一个统治阶级人物，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当然，在封建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统一只能是有限度的。但是，秦始皇第一次统一全中国的功绩，在我国历史上仍然不容忽视。当新兴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要求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秦始皇顺应了这种形势，毅然决然排除旧势力的影响，实现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设立郡县，由中央派官吏去统治全国。秦朝统一局面下创立的很多制度，为以后两千多年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秦始皇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围绕着统一事业这个中心。他兼并六国后十年里，巡行全国东西南北各地，纪功刻石，其主要目的也不是游山玩水，而是为



了提高中央集权的威信，以巩固统一。毛主席指出，封建地主阶级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秦始皇当时正是这样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废除分封诸侯，设立郡县，是秦朝摧毁战国旧制，统一全国的关键措施。秦朝以后，历代的政治家们，往往争论“封建”^{*}和郡县的得失利弊。不少人把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由之引起的统治的不稳固，归咎于秦废“封建”和立郡县。柳宗元的《封建论》，对于否定秦废“封建”的种种说法，进行了有力的批驳，阐明了郡县制的优越性，肯定了秦始皇的革新和进步。

柳宗元的时代是八、九世纪之交，上距秦完成统一约一千多年。他回顾了秦以后的历史，注意了这段历史的经验，提出了从发展观点观察问题的看法。

首先，柳宗元从“生人之初”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讲起。他描绘那时人类所处的环境是遍地野草树木，到处奔走着成群的野兽，而人类自己既不象野兽那样能抓扑和咬人，又没有羽毛，因而“莫克自奉自卫”，就是说不能养活自己，保护自己。柳宗元的描述，和先秦著名法家韩非所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韩非子·五蠹篇》），是一脉相通的。这样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看待远古人类社会，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符合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而儒家则认为只有远古的人类处于最理想的黄金时代，以后社会不是向前进的而是倒退的，今不如昔，因此向后看，宣扬“法先王”，一切要复古。孔子就是鼓吹这种历史倒退的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来为他开倒车复辟奴隶制、反对封建制服务的。柳宗元从发展的观点来观察，所以能认识到“封建”制要为郡县制所代替，正确地论证了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的进步作用。

柳宗元在论证“封建”制被郡县制代替的合理性以前，先追溯了“封建”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象荀子所说那样，“假物以为用”，也就是借外物为自己所用。借外物为用必然会相争，相争不息必然会去找

* 这里的“封建”，是旧史书上的术语，指象西周以至春秋战国那样，分封诸侯，各自建立独立王国的制度，柳宗元的《封建论》即指此，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地主霸占土地剥削农民的封建生产关系。本文凡在这个意义上用的“封建”，都加引号。



那能评判是非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相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个国的国君都去听从威望最高的人的命令,他就成为天子。所以天子是最后产生的。从天子到乡里之长,凡是有恩德于人民的,他们死后,人们一定要继续尊奉他们的后代为首领,因而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柳宗元的结论是,秦以前分封诸侯,世代承袭,割据独立的“封建”状况,“非圣人意也,势也”。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些个人的意志所造成,而是时势——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他所谓的“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去理解,但至少他认为,“封建”是客观时势或环境所造成。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进步的。

在柳宗元关于“封建”制起源的论述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荀子·劝学篇》说,借助于车马的人,并不是脚比别人利便,而能行千里;借助于舟船的人,并不识水性,而能渡江河,因为他们“善假于物也”(会借助于物)。柳宗元运用了“假物”的思想,而他所说的“必将假物以为用”的“物”,似乎不仅是指生活资料,而是包括生产工具,所以才能“为用”。恩格斯教导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人类之最初区别于动物,就在于用手劳动而制造了工具。一旦从事制造工具,原始人类在和自然界作斗争时就有了划时代的武器,能够战胜和改造自然。柳宗元在描述人类“莫克自奉自卫”以后,提出“假物以为用”,他是不是非常朦胧地多少意识到了原始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重大意义呢?关于国君和统一天下的天子,柳宗元认为最先是由逐步推戴而产生出来的。这种说法当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儒家用孔孟之道的天命说,来巩固和提高皇帝的绝对权威,象汉代董仲舒之流说什么“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顺命》),宣扬统治天下的皇帝之出现是天的意志和命令。对比之下,柳宗元的观点不是比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要进步得多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公然号召革命群众去当董仲舒。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陈伯达急起帮腔,一唱一和。林彪反党集团这样热衷于吹捧董仲舒,正是捡起孔孟之道的垃圾作为思想武器,来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尊儒反法,吹捧董仲舒,和他们咒骂秦始皇一样,都出于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封建论》论述了古代奴隶社会中“封建”制的起源以后，指出秦朝改“封建”为郡县的措施的优越性，肯定了这一改革。柳宗元对比了秦以前的“封建”和秦代的郡县制度，指出周代“封建”的弊病是诸侯强盛，天子指挥不动他们，形成所谓“末大不掉”。到周平王东迁以后，天子的地位已经降到和诸侯差不多，“周之丧（灭亡）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秦兼并六国后废除侯王，变革旧制，设置郡县，改派地方官，政权集于中央。柳宗元称赞秦始皇这一革新措施是“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这就充分明确了秦朝统一在巩固统治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柳宗元又观察秦以后直到唐代一千多年的历史，以封建统治的巩固与否为标准，论证了设立郡县的“秦制之得”，和汉朝初年立宗子，封功臣的“封建”之害。他指出，汉朝初年部分地实行“封建”，屡次出现分封诸侯的叛乱，郡县长官却不曾背叛中央，“有叛国而无叛郡”，所以秦朝制度的优越性很明显。汉以后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这一事实也是不会改变的了。然后，他归结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说“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肯定了唐承秦制是合适的。其实，唐朝虽然实行郡县制，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形成许多独立王国，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已经大为削弱。柳宗元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在于州县，而在于军队，他认为当时“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柳宗元赞扬秦制，赞扬唐承秦制的好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当时各地藩镇而发的。他认为唐朝当前的统治，只要善于掌握军队，谨慎选择地方官，国家就可以治理好。这是反对骄兵悍将向长安的中央政权大闹独立性的议论。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讨论历史，同时也含有古为今用的意味，使他的文章为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对于古代一些有见解的史论文章，我们不是都应该这样去领会吗？

有人质问：郡县制如果确是“得”，为什么秦王朝很快就覆灭了昵？柳宗元回答说：因为秦朝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群众，“人怨于下”，所以大呼成群，揭竿而起，一下子推翻了秦的统治。“失在于政”，“非郡邑之制失也”。又有人质问：夏、商、周、汉四朝，都沿用“封建”而统治长久，秦行郡县制而国祚短促，如何解释呢？柳宗元反驳说：曹魏沿袭汉制，晋朝又沿袭魏制，都实行“封建”，不是也并不长久吗？唐朝改变办法，实行郡县制，到柳宗元时，王朝维持已近二百年。



可见并非实行“封建”才能巩固统治。柳宗元还指出，汉代“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意思是说明，汉代只是在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区实行分封，实际上还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柳宗元又进一步论证，在“封建”制下，不问有无才能，生下来就成为封国的统治者，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反不能发挥作用。如果实行郡县制，地方官吏“有罪得以黜（罢免），有能得以赏”，早晨任命后发现他不好，晚上就可以罢免。这样，中央集权的国家对于全国地方指挥自如，当然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就有保证。

柳宗元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替封建统治者谋求巩固政权的方法，竭力阐明郡县制之有利于统一。同时，从中国历史长远发展考察，他肯定了秦朝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的积极意义，这种肯定是正确的。对于柳宗元这样封建地主阶级中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思想家、政治家，如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就能够比较正确地估价他的言论和行动。对于秦始皇，也是如此。虽然秦始皇对人民进行了严酷的压迫和无情的榨取，但他的革新精神和所奉行的法家“法后王”政策，却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向。他废除奴隶社会长期实行的分封制，改设郡县，从而巩固了统一，是对中国历史的贡献。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东西方各国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都实行过分封；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阶段，也都出现过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古代埃及奴隶主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在全国设若干州，州长由法老（国王）任命、调遣。古代波斯的奴隶制帝国，也把全国分为许多郡，由国王派郡守管理。罗马帝国设立行省，由奴隶主的皇帝派官统治。可见郡县制与奴隶制社会并不是永远互相排斥的，郡县制与封建制社会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上述这些奴隶制国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得以加强，全国统一局面之得以巩固，都和实行郡县制密不可分。以古埃及而言，后来州长职位逐渐变为世袭，形成变相的分封制，中央集权即被削弱，统一也就不巩固了。在秦始皇统治初期的具体情况下，反对秦的统一，要求恢复六国分封旧制的人，大都是信奉孔孟之道，梦想恢复殷周奴隶制和礼乐之治的儒生和旧贵族。因此，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兴封建地主制和维护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就必需扫除这两方面的障碍，而这些障碍恰恰来自同一反动势力。因此，秦始皇的两项任务在打击同一反动势力的基础上一致起来。这两项任



务的完成，在当时，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都具有进步意义。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曾经大反秦始皇，骂他焚书坑儒，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是的，我们就是要表扬秦始皇“法后王”的革新精神，肯定他打击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维护新兴地主制的历史功绩，称赞他废分封，立郡县，第一个统一中国的贡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主张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林彪咒骂秦始皇，是为了反对进步，反对革命暴力，以便于自己复辟资本主义。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旧倒退，必然遭到彻底破产。

“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今天处在二十世纪，上距柳宗元的时代又是一千多年了。对于两千二百年前在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意义，我们不仅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来观察、分析，而且有条件从更长远的时间和更广阔的视野来加以评价。在中国，政治上较长期的统一，对于封建社会里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都起着积极作用。国家的统一，对以后中国各族人民抵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独立，也是有利的。如果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不是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而是处于战国纷争或藩镇割据的局面，必然给予帝国主义强盗更多可乘之机，他们“分而治之”的阴谋就更容易得逞，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粉碎敌人瓜分阴谋的力量，必然会受到削弱。今天，在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奴役以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换了人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七亿人民正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做着前人未曾做过的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统一，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必不可少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祖国今天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历史条件及伟大意义，和两千二百年前秦始皇时代的统一当然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但是，两千二百年前的统一，在适应革新进取的要求方面，在符合上升的进步阶级的需要方面，不是也和今天的统一有着类似之处吗？

封建社会的统一，是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联系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



在消灭分裂割据时，“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在巩固封建制，反对奴隶制复辟中起了积极作用，对于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但到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因素时，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越是强大，它抵制、压抑新生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反面作用也就越明显。这正说明，历史是在辩证地发展。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抵制奴隶制复辟、维护新兴的封建地主制所起的积极作用，当然也不应该否定封建社会里国家的统一。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柳宗元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仍然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秦朝第一次统一中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柳宗元对于秦废“封建”立郡县的评价是正确的。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统一时期约占三分之二，分裂时期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分裂的期间越来越短，元、明、清三朝的统一局面，连续了六百几十年。国家的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上不可阻挡的总趋势，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共同一致的要求。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卖国贼林彪也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好，他们搞什么另立中央，寄希望于什么“健康力量”，都是妄图破坏我们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来实现颠覆分裂的阴谋，最后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我们伟大祖国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种黄粱美梦，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是与七亿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注定只有破灭。

柳宗元能够正确认识秦始皇统一的功绩，是和他在哲学上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分不开的。他的《天说》认为，天亦即自然根本不能“赏功而罚祸”。他的《非国语》六十七篇，主要是反驳《国语》一书中用天道、天命之类孔老二的儒家反动历史观去解释历史。例如《国语》记载宋人杀了国王，晋人借机攻宋，说宋人违反天道，天必然要加以惩罚。柳宗元反驳说：自古以来，有多少杀人抢劫比宋人严重得多的，他们却活得很好而且长寿，天的惩罚又在哪里？他还质问说：讲到天，我怎么能知道它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呢？柳宗元对于天的看法和解释，是继承了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子，而和孔孟之道的先验论是根本对立的。由于哲学思想上鲜明的唯物主义因素，才能从客观的形势和环境，从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来观察历史，才能正确评价秦的统一。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柳宗元也和顽固保守、专开倒车的儒家完全不同，而是



倾向于革新。他在顺宗时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一派，坚决反对宦官掌握政权和兵权，积极改革德宗统治时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唐代实行郡县制而仍然出现反对中央统治的叛乱，柳宗元解释其原因说：“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他认为“有叛将而无叛州”，并非由于没有分封诸侯而造成地方叛乱。柳宗元参加的王叔文革新派，受到宦官以及中央和地方守旧派的打击。他们拥立宪宗，逼迫顺宗退位，对王叔文一派大加排斥。柳宗元也从首都长安被斥逐到边远地方，贬为低级地方官。唐以后的封建文人评论柳宗元，大都推崇他在文学上的革新——古文的造就，而很少人同情他的政治活动。这是长期以来主张保守倒退的儒家孔孟之道的恶劣影响。

宋代有两个政治主张上对立的人，对柳宗元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这种评价的分歧，对于我们了解柳宗元很有帮助。主张变法革新的王安石称赞柳宗元是“天下之奇材”（《读柳宗元传》），对于主张革新的柳宗元表示了敬意。王安石还说，尽管柳宗元遭到贬黜，没有被任用，仍然“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就是说，他虽然政治上失败了，其他方面却做出了建树，在历史上留下了业绩。王安石这就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在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反对王安石变法，竭力维护旧制度的苏轼，对柳宗元的评价则另是一样。他虽然也同意《封建论》的某些观点，却公然辱骂柳宗元是“小人之无忌惮者”（什么都不怕的小人），表示不赞成柳宗元的《非国语》，而且概括起来说：“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见《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所载苏轼的《报江季恭书》）。“礼乐”是孔老二拼命鼓吹的“礼治”的标志，柳宗元对它采取否定态度，认为是不足道的事物，因为他在政治思想上是继承法家的。儒家宣扬“天人感应”，认为天有意志，主宰一切，能够影响人世，赏善罚恶。柳宗元不相信什么天道，说“苍苍者焉能与吾事”（《断刑论下》），意即天哪里能管我们的事。这是唯物主义思想。柳宗元在唐代思想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是站在唯物主义一边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政治主张，是与他的哲学思想一致的，并在《封建论》里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尽管苏轼公然污蔑柳宗元，但他上述两句带有贬意评语，却从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予了柳宗元非常确切的评价，从今天看也是高度的评价，这是顽固派苏轼决想不到的吧？

（原载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九日《北京日报》，转载时作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补充）



“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倒车

天津轮胎厂工人评论组

两千多年前，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孔子，为了维护日趋崩溃的奴隶制，抛出了“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从那以后，凡是主张开倒车的反动家伙，都把“克己复礼”的反动主张引为经典，奉为至宝。林彪及其死党，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多次互相题词，胡说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在九大以后，林彪反复鼓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就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狼子野心。

孔子处在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期。反动的奴隶制以及维系它的反动的上层建筑——“周礼”，已经土崩瓦解，新兴的封建制逐渐地确立。面对着这场新旧两种制度的斗争，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叫嚷什么：“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就是说，孔子要人们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那么什么是“克己”、什么是“复礼”呢？在当时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孔老二的所谓“克己”，从奴隶主贵族内部来说，就是要加强团结，防止互相倾轧；对奴隶主以外的革命阶级来说，就是要束缚他们的思想，控制他们的行动，防止他们起来“犯上作乱”，不准他们造反，以巩固摇摇欲坠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奴隶制的一套腐朽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以便阻止和破坏新兴封建制度的建立，镇压奴隶的反抗，继续维持奴隶主的天下，把历史拉向倒退。

两千多年过去了，孔老二的阴魂仍然不散，他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又被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拣了出来，当作法宝，作为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及其死党卖命地鼓吹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亿万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这个伟大的胜利。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恶毒攻击和无耻的诽谤，为一小撮被打倒的阶级敌人鸣冤叫屈。林彪在这时抛出“克己复礼”的反动谬论，集中地代表了他们反革命的利益、要求和愿望，道出了他们反革命的心声。林彪疯狂叫嚷的“克己复礼”，究竟是什么玩艺儿？在他们那里，“克己”就是要他的死党为他们阴谋篡权复辟卖命，按照法西斯的“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而所谓“复礼”，就是要复封建主义的“礼”、资本主义的“礼”、修正主义的“礼”，就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手段篡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在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里直言不讳地供称，要在苏修“核保护伞”下，充当儿皇帝。这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让地主资本家重新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是我们决不答应的。

林彪的“克己复礼”与孔子的“克己复礼”，尽管时代不同，他们所要复辟的剥削制度不同，但是，他们的实质是一样的。他们的政治路线，都是复辟已经腐朽没落了旧的剥削制度，都是反对进步，反对革命，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退。历史上的孔老二为了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主张。这就是说，他要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没落的旧贵族人士。一句话，就是要复辟奴隶制，把在社会大变革中被推翻的奴隶主及其代表人物，重新捧上历史的宝座。林彪及其死党，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恢复地主资本家失去的天堂，大肆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这实际上是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可见，林彪和孔子都是没落的旧制度的卫道士，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家伙。

毛主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历史经验说明，每当一场大的社会变革之后，在如何评价这



场大的变革的问题上，往往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斗争的实质，是坚持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变革，还是反对社会进步，否定社会变革。这种斗争，经常是同尊孔与反孔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我国劳动人民掀起的一次次革命斗争，总是触及到孔子及其反动思想。而一切妄想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是尊孔的，他们总是祭起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法宝”，为已经灭亡的反动制度和反动阶级招魂，向进步的社会制度和革命阶级猖狂反扑。今天，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依然存在，并且将长期存在。建国以来，在历次大的政治运动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如何评价这场政治运动的大辩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如何对待这场大革命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肯定与否定、前进与倒退的斗争。我们要通过批林批孔斗争，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决反击阶级敌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和诬蔑，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当前，批林批孔斗争正在蓬勃开展。孔子是搞反革命复辟的祖师爷，林彪是拜倒在孔子脚下的忠实门徒。林彪不仅从理论上鼓吹孔子的“克己复礼”，把它当作座右铭，而且在行动上实践“克己复礼”，大搞反革命复辟。斩草必须除根。深入批林批孔，彻底批判林彪贩卖的孔老二的黑货，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体系，批判林彪所鼓吹的孔子的“克己复礼”的反动主张，就能更深入地揭露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和他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从思想上挖林彪的“祖坟”，清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

深入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必须打一场人民战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那种认为批林批孔仅仅是学术界的事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党委要抓大事。批林批孔斗争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全党的大事，是阶级的大事，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我们工农兵要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批孔斗争的光荣传统，学习他们批孔斗争的历史经验，努力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掌握思想武器，坚持斗争哲学，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中庸之道是政治骗子的哲学

上海东风线厂工人 沈逸珍 丁佩蓉

两千多年前，孔子把中庸之道奉为最高的道德。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林彪又称中庸之道是“合理”的。两个骗子，一脉相承。真是无独有偶。

何谓中庸？孔子的忠实信徒朱熹有一个注脚：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经过这一番解释，此道看上去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实际上却是一个弥天大谎。

在阶级社会里，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都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个阶级之间，不可能有统一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恩格斯说过：“**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世界上那有什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我们受过阶级压迫的工人都懂得，资本家必然要偏向资本家，工人当然也一定是偏向工人。正如鲁迅所说的：“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不管作者如何将真象掩盖起来，偏和倚，总要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

中庸之道是一种骗人的哲学。孔子鼓吹中庸，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是深刻地打上奴隶主阶级的烙印的。中庸的目的，就是要“复礼”，复辟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等级制度。凡是主张倒退的，就一定要骗人，但是，这种骗人的哲学又总是为他们自己的行动所戳穿。就拿孔子来说，他的一生使尽了反革命权术，八面玲珑，貌似公允，实际上是伺机而动，一遇机会，就显露出凶残横暴的本相来。孔子一口一个仁者“爱人”，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一切人，爱的只是反动的奴隶主。他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堕三都，什么杀人、毁城的事都干出来了，这算什么仁者“爱人”？根本是在骗人。号称“亚圣”的孟子，对孔子的这套骗术，也心领神会，说什么“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公开宣扬骗人有理。历史上鼓吹中庸之道的，都是一些政治骗子。朱熹的伪道学就是这种骗人哲学的标本之一。那个视中庸为“圣人之言”的曾国藩，倒是以“杀人如剃头”的大刽子手而闻名。蒋介石一面高喊中庸之道，一面却挥舞屠刀，大肆屠杀革命人民。叛徒、



卖国贼林彪也是这样。他在鼓吹中庸之道的时候，却在暗地里磨刀霍霍，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用极其残暴的法西斯手段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镇压广大革命人民。总之一句话，中庸之道，不过是反动派镇压人民群众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一切问题，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历史，观察社会。“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阶级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这些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那里谈得上什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呢？林彪鼓吹中庸之道，目的就是想用它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放弃同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好让他们这伙坏蛋去搞复辟。林彪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我国人民的反修斗争，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我们一定要识破他们这种反革命伎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只有坚持斗争，才能扫除一切害人虫，才能斗出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来。

孔孟和林彪鼓吹的中庸之道，表现在哲学上，就是折衷主义，调和论，在一切尖锐的斗争面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这也正是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机会主义者为什么要掩盖自己的观点呢？因为他们是一群混在工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蛀虫，他们需要掩盖自己的真象。林彪一伙有句自白：“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这不就赤裸裸地暴露了机会主义者骗人哲学的反动实质吗？他们需要用这种骗人的哲学，给自己的脸上贴金，需要用中庸之道来蒙蔽人民的眼睛。假象毕竟是假象，真象迟早总要暴露，他们总要错误地估计形势，跳出来，撕破自己的假面，把真象告诉大家。到头来只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林彪的下场不就是这样吗？

共产党人从来是开门见山，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因为我们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我们不谋私利，光明正大，特别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更是旗帜鲜明，敢于斗争，敢于坚持原则。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孔子垮台了，林彪也垮台了。但是，批判孔孟和林彪所鼓吹的中庸之道，仍然是我们当前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



揭穿“人道主义”的骗局

——评苏修叛徒集团尊孔反法的丑剧

安徽师范大学学员 刘泽林 朱英武 黄志宏
任学玲 刘奇葆

近年来，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导演下，莫斯科一直在上演着尊孔反法的丑剧。那些奉旨行事的苏修御用文人，声嘶力竭地为孔学大唱赞歌，调子已经高得无可再高。他们胡说什么“孔子和孟子都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孔孟的“仁政”“为经历了许多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的眼里，孔老二简直成了“人道主义”的老祖宗。

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嘲弄着这场丑剧的演出。苏修叛徒们即使替孔子穿上十打“人道主义”的时髦服装，也决计改变不了这个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本来面目。孔子曾毫不掩饰地声称，他的终身奋斗目标就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即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重新扶起失去权势的贵族，并为此而惶惶如丧家之犬，奔走呼号了一辈子。他说过“仁者爱人”之类的鬼话，但他爱的只是奴隶主贵族，决不爱奴隶们。他恶狠狠地咒骂劳动人民是“鸟兽”，叫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要奴隶们乖乖地听任奴隶主的驱使和奴役。一旦奴隶们敢于起来反抗，他更是凶相毕露，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郑国的正卿游吉血腥镇压了奴隶暴动，孔子立刻大声喝彩，喊叫“善哉”，露骨地发泄他对奴隶阶级的刻骨仇恨。孟子的终身奋斗目标也是为没落奴隶主搞复辟。他对人民的敌视态度，跟孔子别无二致。他主张的“仁政”，只是把孔子鼓吹的“宽猛相济”的反革命两手加以发挥而形成的一套“治民”之术。他说：“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对于劳动人民，对于奴隶，他是要“使”、要“杀”的，不过是要使得巧妙，杀得不露痕迹罢了。看看孔孟的言论和行动，哪能找得出一点为“人民的利益”的影子！正如鲁迅所指出：



“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孔孟的所谓“人道”，不过是奴隶主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奴隶之道！苏修叛徒们无耻地吹捧孔孟的“仁政”思想，甚至不惜把他们打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这只能说明他们就是当代的孔孟，是一小撮打着为人民谋利益的幌子而专事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老爷。

尊孔必然反法。在苏修叛徒们看来，法家主张“法治”，主张“公开的极权主义”，就是“反人道主义”。因此，他们给实践法家主张的秦始皇安上“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君”的帽子，大骂“焚书坑儒”是“残忍行为”，是对“儒家的人道主义”的“驱逐”。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这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他实行“焚书坑儒”，完全是为了打击那些图谋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儒生，进一步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国家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总是需要凭借暴力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对于被统治的阶级说来，从来就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法治”是这样，“仁政”又何尝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孔子在鲁国充任司寇刚刚七天，便以“乱政者”的罪名，杀害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人士少正卯，并且暴尸三日以示众，这不是很有些法西斯气味吗？此外，奴隶主阶级车裂商鞅、射杀吴起，也都能充分说明“仁政”丝毫不“仁慈”。不过，法家敢于公开宣布“法治”要凭借暴力，正说明他们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阶级。而孔孟却用“仁”学的虚伪词句，竭力掩盖奴隶主专政所使用的反革命暴力，只能证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在当时已经日暮途穷，除了进行欺骗而外，再没有别的出路。苏修叛徒们对法家大加诋毁，对“仁政”尽情美化，恰恰表明他们自己的屁股是坐在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营盘里。

苏修叛徒集团之所以要歪曲历史，反法骂秦，决不是因为闲得无聊，要去找两千年前的死人算账。就在他们发出的对秦始皇的恶骂中，有人特意“提醒大家”，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又象秦始皇时代那样”，“扼杀”了中国“文化的伟大成果”。直到最近，还有人扯着嗓门骂我们以法家“极权主义”之“古”，用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今”。不难看出，这帮叛徒所以要那么卖力地尊孔反法，正是为了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亿万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奋起批判封、资、修的反动文化，向包括孔学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发动了英勇的进攻。这在我们叫做革命的大批判，在苏修则叫做“扼杀”“文化的伟大成果”。可见他们的“成果”，正是我们的糟粕，他们心中的宝贝，正是我们民族的痛疽。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必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们摧毁孔学这个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精神支柱的斗争方兴未艾，今后还将更加深入地~~进行~~下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我们正是在彻底破除封、资、修反动文化的伟大斗争中，开创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新篇章。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把千百年来由剥削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的舞台夺了回来，一批光彩夺目的工农兵英雄形象，登上了文艺的舞台；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改变着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生气勃勃的工农兵学员，跨进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赤脚医生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成长，医务工作者背起药箱到农村去，改变着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总之，我国的各个文化领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深刻变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争艳、春色满园的大好景象。勃列日涅夫之流的蹩脚的造谣专家们，在那里拼命制造“消灭文化”之类的拙劣谣言，除了进一步暴露他们自己是一伙剥削阶级文化的辩护士以外，丝毫不能阻挡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奔腾向前！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势力，极大地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苏修从我国内部进行反革命颠覆的阴谋。苏修叛徒们气急败坏，无可奈何，骂我们是“极权主义”。我们说，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极权主义”者，专政之谓也。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你们这帮叛徒们篡夺苏联人民的革命果实的沉痛教训证明，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如果不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坚决镇压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要遭殃，社会主义的江山就要变色。马克思早在一八七五年就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代，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也把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区别真假马克思



主义的试金石。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保障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而对反动派的反革命活动坚决予以取缔和镇压，这正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修叛徒们越是攻击我们，越是暴露他们自己背叛马列主义的无耻嘴脸。它从反面证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此狂叫怒骂，究竟是在给谁撑腰打气，是一目了然的。刘少奇、林彪这两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头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刘少奇在六十年代重新抛出的黑《修养》，散发着孔孟之道的臭气。林彪一伙也把孔学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他们把孔子的“仁”学吹上了天，竟然宣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他们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还高唱孔孟“仁义”、“忠恕”的滥调，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他们用法西斯手段篡权复辟大放烟幕。因此，这伙叛徒、卖国贼博得了苏修叛徒集团的青睐。随着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活动的逐步加紧，苏修尊孔反法的调子也愈来愈高。他们一唱一和，反革命的主旋律就是咒骂我们是“独裁”，是“极权主义”。苏修大肆吹捧孔孟的“人道主义”，大骂法家“反人道主义”，秦始皇是“暴君”，林彪就在阴暗角落里咬牙切齿地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是“独裁”；苏修鼓吹“儒家赞成建立一个仁政的政府”，林彪便亮出“仁政”的招牌，叫嚣要将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苏修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扼杀文化”，林彪之流便哼起唐代章碣的诗，含沙射影，诽谤文化大革命是“焚书坑儒”，妄图变天夺权。只要把苏修尊孔反法的表演同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稍加对照，人们就不难发现，苏修尊孔反法的目的就是反华，就是要把刘少奇、林彪这类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扶为“儿皇帝”，变中国为苏修新沙皇的殖民地。然而，哪里料到，林彪还没来得及说出苏修要他说出的“决定性的话”，就已经自我爆炸。“超级间谍”葬身沙丘，外国主子跌足三叹。新沙皇同刘少奇、林彪一伙玩尽了捣



鬼的花样，到头来不过是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主席曾经指出：“**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苏修叛徒集团正是这样。自从他们篡权复辟以后，就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新型官僚资产阶级的天堂，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地狱。他们一方面不断强化法西斯专政，在全国各地设立大量监狱、集中营和所谓“疯人院”，疯狂镇压革命者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又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所谓“人道主义”，妄想给自己的法西斯专政披上一件“仁慈”的外衣。然而，他们越是高唱“人道主义”的陈词滥调，就越是暴露出自己面目的虚伪和可憎。最近他们上演的话剧《外来的人》，据说是对“人道主义”作了“现代的严格的理解”，苏修文化界的头目们为此着实大吹大擂了一番。然而，在观众面前出现的主人公却是一个“小小独裁者”。此人同孔子一样，很有些恶霸作风，满台只听见他对工人的训斥声。面对着怒火满腔的工人群众，他暴跳如雷，疯狂叫嚣：“得制服他们，得卡住他们的脖子！”这真是活龙活现地反映出在苏联横行霸道的资产阶级新贵族们的法西斯嘴脸。

玩弄“人道主义”的骗局来愚弄人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的惯用伎俩，也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惯用手法。当年第二国际的叛徒考茨基之流就是这么干的。列宁曾无情地嘲笑过这些“卑鄙英雄们”：“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等等空话吧。现代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夸大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象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望见‘善良君子’极‘光滑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地断定他‘大概是个骗子’。”（《伟大的创举》）列宁这番话也准确地画出了勃列日涅夫这伙骗子的尊容。不管新沙皇怎样求救于孔子的亡灵，乞灵于“人道主义”，都掩盖不住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孔子这块“敲门砖”早已不灵了，救不了苏修叛徒们的命。等待他们的，必将比第二国际叛徒们更可耻的下场！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

河北景县董故庄大队党支部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当董仲舒。”董仲舒是什么人？林彪为什么吹捧董仲舒？

提起董仲舒，俺们贫下中农就气、就恨！这个董仲舒是孔孟之道的吹鼓手，是地主阶级的狗奴才。两千年前，西汉的时候，董仲舒向皇帝献了条毒计，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说，当今皇帝的天下象烂木头泥巴墙，一冲就垮。要防止老百姓造反，就要建一道思想堤防，这道堤防就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要人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不反抗，不斗争，俯首帖耳当奴隶。他认为用这一套来麻痹束缚老百姓，皇帝的宝座就牢靠了。董仲舒因为宣扬孔孟之道，维护封建制度有功，成了地主阶级的大红人。两千年来，封建皇帝念念不忘他的功劳，称他是“百儒之首”、“七十三贤”、“二圣人”。在我们董故庄这里盖了“董子庙”，立了“董子像”，挂了“阐道醇儒”的匾，还赐给董庙大片的庙地。直到解放前夕，董庙里一直不断香火。

从前，董故庄一带的土地，大都是董庙的庙地，穷人连块搭窝棚的地角都没有。董故庄的穷人祖祖辈辈给董庙扛活，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点亮了董庙里的蜡烛，熬干了脊梁骨里的油。“董子爷”是剥削阶级的“爷”，是牛鬼蛇神们的“爷”，是俺们贫下中农世代代的仇敌。在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今天，林彪又跳出来吹捧董仲舒，俺们贫下中农一听，肺都气炸了！俺们要揭露他的阴谋，戳穿他反革命的狼子野心。

吹捧死人，是为活人服务，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林彪这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惯会耍弄“偷梁换柱”的手段。他要人们“都当董仲舒”，说穿了，是他自己要象董仲舒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就是说，他表面上打着这样那样的招牌，实际上是要“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把孔孟之道和他的反动思想抬到“独尊”的地



位，妄图达到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林彪这个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腐朽透顶，反动透顶，拿不出什么新鲜玩艺来和无产阶级较量，只好从孔家店里拣点破烂当成复辟的武器。林彪的反动思想，就是从孔孟之道里脱胎出来的。孔老二讲“天命”，说“老天爷”把人分成“上智”和“下愚”，“君子”和“小人”。奴隶主是“上智”、“君子”，是当然的统治者，奴隶是“下愚”、“小人”，只能当牛做马。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是“天然合理”。孔老二就是用“天”来愚弄奴隶，维护腐朽了的奴隶制。林彪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也学孔老二的把戏，把“天”搬了出来。不过他变了个手法，讲“天才”，把人的聪明愚笨说成是先天的，其实还是孔老二的“天命”的黑货。他把自己打扮成天生的“天才”，把工农兵群众看作是天生的“群氓”。“天才”天生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群氓”天生没头没脑，只能跟着瞎跑。他就是这样来制造反革命舆论，欺骗群众，妄图达到他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孔老二宣扬“忠”，要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对周“天子”尽“忠”。他想用对周“天子”的“忠”把奴隶主团结起来，共同镇压奴隶的反抗。林彪为建立封建买办的法西斯王朝，原封不动地接过孔老二的“忠”，当成反革命的精神支柱。他们一伙用“忠”来组织反革命的“联合舰队”，培养“无限忠于”林家王朝的“阶级感情”，不但对林彪要“忠”，对林彪的小子也要“忠”。孔老二鼓吹“仁”。他的“仁”，是对奴隶主贵族的“仁”。孔老二活着的时候东跑西窜，为的是恢复破败了的奴隶制国家，把倒了台的奴隶主贵族扶到台上去。对于奴隶主贵族，孔老二“仁”得很，对于奴隶，对于进步力量，他就不讲“仁”了。他把革新派杀了头，又到处帮助奴隶主镇压奴隶的暴动，一副刽子手的嘴脸。林彪操着孔老二的腔调，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模样，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他的“仁”，是对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仁”。他的“仁”，就是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对失去“自由”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政治上的解放”，让他们重新上台。对于广大革命人民，则要实行白色恐怖。他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手段，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充分暴露了他所叫嚷的“仁”是什么货色！

林彪和董仲舒是一个窝里的蝎子，一个坑里的蛆。一个要用孔孟之道来挽救剥削制度的灭亡，一个要用孔孟之道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没有好下场。尽管他们叫喊“不成功便成仁”，要同革命人民拚个你死我活，但是他们成不了“功”也成不了“仁”，而是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打好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某部战士 赵忠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不断深入，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也在不断深入。许多同志口诛笔伐，积极投入到这场阶级斗争中去，正在出现一个万炮齐轰林彪和孔孟之道的可喜局面。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如何对待这场斗争？是挥戈上阵、积极参战，还是徘徊观望、按兵不动？是发动群众、起促进作用，还是向群众泼冷水、当促退派？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意义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打好这场批林批孔的人民战争。

要彻底清算一条错误路线，必须分析它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我们要把批林引向深入，就要做这个挖“根”寻“源”的工作。否则，遇有适宜的气候，没有挖出来的黑根，还会冒出毒芽，没有填死的毒源，还会泛起毒流。那么，林彪的“根”在哪里、“源”在何方？请看事实：当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地要篡党夺权，而抛出反党政治纲领时，他们搬出了孔子的“正名”之说为根据，叫嚷如果不把国家大权交给他，就是什么“名不正言不顺”，妄图使其反革命复辟活动合法化；当他们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动突然袭击，抛出反党理论纲领时，又拣来孔子的“天命论”为救命草，顽固地坚持唯心论的“天才论”，无耻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妄图实现反革命复辟；当他们躲在阴沟里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时，又钻进“孔家店”里，翻出所谓“仁政”、“礼治”等破烂货，以“不成功便成仁”做强心剂，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人民，“解放”一切牛鬼蛇神；当他们肆意攻击党的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政策时，还是以孔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为反动武器。够了，这些铁的事实，足以使人们大开眼界：哦，原来林彪思想上政治上的一条黑根子在这里呀！

在中国，历来的反动派无不尊孔反法，对孔子追谥加封，捧上云天，幻想借助孔子的亡灵，来维持他们垂死的统治。近代史上，这种尊孔反法的丑剧连续不



断。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到窃国大盗袁世凯；从张勋、康有为尊孔复辟，到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反革命生涯，无不抬出孔子作为自己反动行径的理论根据。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与这些反动人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都是尊孔崇孔的。陈独秀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王明胡说什么孔孟之道是“民族美德”，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篡改历史事实，宣扬“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应该充分利用它”。他的黑《修养》，实际上就是孔孟之道的翻版。叛徒、卖国贼林彪紧步王明、刘少奇的后尘，和盘端出孔子的反动思想，加以乔装打扮，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敲门砖”。历史证明，占据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以孔子的反动思想为自己的统治辩护，借以愚弄人民；失去统治地位的，以孔子的反动思想蛊惑人心，妄图卷土重来，复辟上台。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孔孟之道是一种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历代反动派，包括刘少奇、林彪之流虽然与孔子不是处于同一时代，但他们同为没落的剥削阶级，在思想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林彪就是中国现代的孔子。我们通过对孔子这个反动奴隶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深刻批判，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黑根，可以进一步认识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把历史车轮向后拉的极右实质，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因此，批孔和批林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人人挥笔上阵，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批孔是“哲学家、史学家和‘秀才’们的事，和工农兵关系不大”。这种观点既抹杀了批孔斗争的阶级性质，又否定了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成是“打笔墨官司”的“纯学术讨论”，这是资产阶级惯用的伎俩，我们千万不要上当。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从来是阶级斗争的战场，不是超阶级的世外桃源。而阶级斗争从来是千百万群众的共同事业，决不只是少数“学者”、“秀才”的事情。党的十大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正在开展的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是同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密切联系着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是剥削阶级赖以向无产阶级反扑的桥头堡。能否打好这一仗，是关系到党变不变修、国家变不变色的大事，与我们每个同志都息息相关，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置身事外。



毛主席在总结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深刻指出：“**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广大工农兵群众，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主体，最聪明，最有才能。不仅是政治、经济战线上的主力军，而且也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主力军，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最有发言权。毛主席历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指出什么工作都要大搞群众运动，反对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争，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交给全国人民讨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极大的信任和鼓舞。我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只有勇敢地登上上层建筑的舞台，才能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一些专业工作者做一些专门研究，发表一些有材料、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是必要的。但是，只靠这一个方面，是打不垮顽固的敌人的。要真正制敌于死命，必须靠万弹齐发的密集火力。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非常顽固，不肯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只有全国人民一起行动起来，才能使旧思想失去藏身之所。孔子的反动思想流毒很广，根深蒂固。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但它仍然阴魂不散，频频作祟，这就更加看出有必要发动亿万群众奋起批判，以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孔子的反动思想，表面看起来象个庞然大物。其实，不过是只纸老虎而已。他的思想和实践都是违背客观现实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我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有理由蔑视他，有能力有信心批倒批臭他。鲁迅说过：“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孔子是反动统治阶级捧起来的，人民群众从来不买他的帐。从孔子在世之日，到孔子死掉以后，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痛快淋漓的批判。当时的劳动人民就一针见血地批判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经常使他处于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狼狈境地。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在军事、政治上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也在思想上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孔运动。洪秀全砸掉了孔子的牌位，斥之为“妖魔”，“教人之书多错”，使反动的儒家孔教的威风扫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的今天，人民群众如虎添翼，批判能力大大提高，批判孔子这具政治僵尸，更加不在话下。“**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让我们挥起革命的战笔，积极参加当前这场阶级斗争，把林彪和孔孟之道批透批臭。



· 杂 文 ·

评万事“无有大于此者”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说明了什么？

康 立

要认识批孔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感谢蒋介石，这一次又跳出来给我们上课了。他在最近发表的一九七四年“元旦文告”，就是一份绝妙不过的反面教材。

这篇“文告”，说长不长，短短二千余字，尊孔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它面对着中国人民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惊叫：“五千年圣哲相传的道统”处于沦亡之中，“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忧患，国民最大的痛苦，祸固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而国民革命的责任，亦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

好一个“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这句话颇为忠实地供出了蒋介石与孔子相依为命的关系。蒋介石此人是以尊孔反共起家的。他岂止在今天，而是长期以来一直把尊孔看成是“无有大于此者”的。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亲自到曲阜“朝圣”，并宣称孔子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孔教可以“正人心”、“辟邪说”。以后，配合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他又多次举行祭孔的典礼，鼓吹孔子的教义，就象鲁迅所尖锐批判的：“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重视尊孔？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

一切反动派总是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蒋介石演了一生尊孔反共的丑剧。结果呢，共产主义没有能在中国铲除掉，蒋介石王朝在我国大陆的反动统治却被共产主义给铲除掉了。但就在他逃窜到我国的海岛上以后，尊孔仍然是蒋家反动小朝廷中的一桩头等大事。什么孔孟学会啊，什么祭孔典礼啊，



群魔乱舞，闹得不亦乐乎。更有甚者，这个小朝廷中的一批孤臣孽子，以法西斯特务头子陈立夫为首，在前几个月筹划捐建一座孔子的铜像，准备远涉重洋送到美国去。竖立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新建的所谓“中国文化公园”中。这批反动派们过去长期地用孔子欺骗和毒害中国人民，今天又异想天开地妄图用孔子去欺骗和毒害美国人民。用心固然良苦，但前车可鉴，到头来终究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死孔子从来是与将要死亡的阶级存亡与共的。蒋介石在台湾的反动统治，从精神上说，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死孔子来苟延残喘的。他们一天不尊孔，日子就混不下去。因此，中国人民一起来批孔，蒋介石就深感大难临头，坐立不安，惶惶然不可终日，简直怕得到了极点，活象挖了他的祖坟一样。这就是他情不自禁地惊呼“祸国无有大于此与急于此者”的原因所在。

将尊孔看成头等大事，把批孔视作洪水猛兽，这是一切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蒋介石是这样，别的反动人物也都是这样。远的不说，就在中国近代，每当革命人民起来对孔子及其孔学开展大规模批判的时候，那些反动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都如丧考妣，痛哭流涕，总要自己跳出来作一番拙劣的表演。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孔子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声讨，大刽子手曾国藩跳出来哀叹：“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反动的孔学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攻击与否定，大卖国贼袁世凯跳出来惊呼：“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民德如斯，国何以立。”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孔子及其反动的孔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封建余孽林琴南等惊痛欲绝，把这次批孔运动看成是洪水猛兽时代的来临，气急败坏地到处称颂“孔子为圣之时”，诅咒革命人民“覆孔孟，铲伦常”是“叛亲蔑伦之论”。思想斗争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在思想上搞尊孔，目的是为了在政治上搞复辟，对革命进行反攻倒算。在中国，尊孔派历来就是复辟党、辫子兵的代名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孔夫子及其死党，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遭到了批判和清算。孔学作为反动的意识形态，正在被革命人民送进坟墓。帝修反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破产。因此，国内外的反动派们



都对这场革命感到特别痛恨和仇视，一个个忍不住跳将出来，为保卫所谓“圣哲相传的道统”而进行垂死前的疯狂反扑。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他以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自居，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搞什么“四书集句”，叨念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他和他的死党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连续四次把这几句话写成条幅，相互赠送，挂在卧室内作为座右铭。这桩事实，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蒋介石和林彪，一个说尊孔是“大于”一切、“急于”一切的事，一个说“克己复礼”是“悠悠万事”中最“大”的事。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尊孔看成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特别重要手段，把亿万革命人民的批孔视作灭顶之灾，这件事是很富有启发作用的。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反动的孔学对于剥削阶级来说，是他们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命根子。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坚决把批孔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推动批林的继续深入，进一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归根到底，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孔孟之道是林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所信奉的反动道统，我们一定要对它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咒骂我们“大搞‘批孔小组’‘批孔会’‘批孔墙报’……来‘刨根问底的深入批判孔子’，使‘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这几句话总算是说对了。蒋介石听着，我们不仅已经这样做了，并且还要继续这样做。群众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还在后头呢！我们就是要“刨根问底的深入批判孔子”，还要进一步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蒋介石的“元旦文告”毫不掩饰地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批孔运动的极度恐惧心理。这个“文告”实际上就成了“尊孔讣告”。批孔，对于反动派是一件大丧事，对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广大人民来说就是一件大喜事。为了祝贺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了从蒋介石“文告”这份反面教材中看清批孔如何使反动派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特在此发表评论。



抓大事 抓路线 抓政治思想工作

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

田志松

党的十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号召各级党委要注意抓大事，这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在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过程中，我们应当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深刻领会抓大事对于反修防修的重要意义，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现在，一个批林批孔相结合的革命大批判高潮正在全国蓬勃兴起，这是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开展的一场新的进攻。批林批孔是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抓大事，就要抓这件大事。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以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孔决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这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大事。各级党委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姿态，放手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切实把这件大事抓紧抓好。

什么是大事？什么叫忘掉了大事？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毛主席曾经反复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可避免地



要反映到党内来，表现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为搞马克思主义同搞修正主义的斗争。毛主席经常告诫全党：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并指出：“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它有国内阶级根源，又有国际背景。修正主义者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相勾结，妄图在我国搞复辟，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先后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个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他们代表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妄图通过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国就要沦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果实就要丧失。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抓大事，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可忘记反修防修，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革命，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革命也是这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次共和国成立，经过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复辟和反复辟，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内战和外战。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尚且如此，何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革命，不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反复较量，胜利是不可能巩固的。我们一定要看到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看到反修防修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坚持不懈地反修批修。

党委要真正成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指挥部，就必须关心全局，经常讨论政治形势、政治路线、政治思想工作、党的政策等重大问题。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都要着重于研究这些问题。如果整天埋头小事，不认真看书学习，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状况缺乏真切的了解，那么，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就会分不清阶级阵线，分不清路线是非，就会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这已为两条路线斗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毛主席曾尖锐地指出：如果“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



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主席的这段话，深刻指明了抓大事的重要性和不抓大事的危险性，是对全党同志深刻的教育。

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之流，总是极力反对和破坏我们抓大事。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就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既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那还有什么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事可抓呢？叛徒、卖国贼林彪居心险恶地叫嚷：我国已经“毫无修正主义”了，既然“毫无修正主义”，那岂不等于说没有反修防修、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大事了吗？这完全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翻版。显然，这不过是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抓大事的一种手段，完全是为了骗人。林彪这个最阴险最毒辣的反动家伙，一面反对我们抓大事，一面把孔子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纲领当作他的座右铭，不断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就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事实上，林彪一伙在高唱我国已经“毫无修正主义”的和平曲的同时，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磨刀霍霍，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加紧策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列宁曾经指出：“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刘少奇、林彪正是这样。他们破坏我们抓大事，就是为了干他们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大事。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他们这一套反革命策略，并与之划清界限，才不会上他们的当。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忘掉了抓大事，而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那么，不管自觉不自觉，客观上都是适应了阶级敌人的需要。

毛主席从来都是抓住大事不放的。我们党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兴旺发达，我们的国家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就是由于毛主席紧紧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这个纲，紧紧抓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教育全党，团结全国人民，打退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理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凡是关系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毛主席都是亲自抓的，而且是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前进的过程，就是毛主席领导全党抓大事的过程，这是最基本的事实，也是我



们最基本的经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就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面对这样一个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毛主席亲自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刘少奇和林彪两个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了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受到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大大提高了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随着时间的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越来越明显；我们对这场伟大革命的经验的了解也将越深刻。如果说无产阶级过去已经有了打败阶级敌人从外部搞武装进攻的经验，那么，我们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一步取得了粉碎修正主义妄图从内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我们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深刻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

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同各条战线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密切联系着的。在如何对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等新生事物上存在的斗争，在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斗争，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争，关于“走后门”等问题上同不正之风的斗争，以及城乡出现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都是尖锐、激烈的。我们不可丧失警惕性。抓好批林批孔的斗争，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去解决上述矛盾。我们必须继续抓紧批林批孔这件大事，深入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放手发动广大群众批林批孔，打退资产阶级各种形式的进攻。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继续批判尊孔反法的反动思想，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各项工作才能提起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完成一项工作，需要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路线问题、政策问题。抓住了路线，就抓住了挂帅的东西，决定全局的东西，就能带动和促进各项工作的开展。路线搞对头了，



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群众中蕴藏着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就能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各项工作就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不断出现新面貌。相反，党委不抓大事，不注意阶级斗争，不注意方向道路，即使主观上想把工作做好，结果总是适得其反，甚至会走到斜路上去。有些同志看不到大事，整天陷在小事里拔不出腿来，难道他那里不存在路线问题吗？当然不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工作都有一个为哪个阶级服务、对哪个阶级有利、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都离不开一定路线的指导，不是执行正确的路线，就是执行错误的路线，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执行某种路线。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对抓大事的认识，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不仅各项具体工作有路线问题，政治思想工作也有路线问题。抓大事，抓路线，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提起纲来。政治思想工作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为实现党在一定时期的政治任务服务。不抓大事，不认真研究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不分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现实表现和特点，政治思想工作就没有明确的目的和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离开了党的路线，离开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事论事地去做，触及不到资产阶级，无损于修正主义，那还有什么用呢？有些地方和单位也做政治思想工作，但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破得不力，无产阶级正气上不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能得到发挥，原因就在于没有抓大事、抓路线，没有举起纲来。可见，政治思想工作离开了大事，同样会走到斜路上去。

抓不抓大事，抓得好不好，对党委的马列主义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是一个实际的考验。要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就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它是披上马列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刘少奇、林彪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他们是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窃据了重要职务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常常利用我们的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低的弱点，把唯物论、辩证法篡改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马列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刘少奇是如此，林彪也是如此。我们要抓大事，就包括要抓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件大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弄通了，才能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掌握抓大事的主动权。事关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当认真刻苦地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



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岳 衡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经验。我国工农业增产的潜力很大，要不断挖掘潜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使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需要我们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继续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二十多年来，在我们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各项事业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是连我们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是靠什么得来的呢？一没有靠对外扩张、掠夺的霸权主义，二没有靠乞求超级大国援助的奴隶主义。我们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回顾过去的战斗岁月，帝国主义曾经长期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社会帝国主义也妄图卡我们的脖子，以为不拜倒在他们的脚下我们就不能过日子。但是，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不管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施展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也没有能够阻挡全国人民胜利前进的脚步。我们不但没有被“锁”住，被“卡”死，日子反而越过越好。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群众、爱国同胞的共同奋斗，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日益巩固壮大，科学技术和文教卫生事业欣欣向荣。我国已经由一个极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变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证明，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就天不怕，地不怕，一切困难踩脚下，就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人类的历史，社会的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历史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抹杀这一真理。为



了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挽救他们濒于灭亡的命运，总是把他们自己及其代表的那个反动阶级吹嘘成历史的创造者，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孔子鼓吹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就是对剥削者的无耻吹捧，对劳动人民的恶毒污蔑，是为他反对封建制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目的服务的。所谓孔孟之道，就是主张倒退的反人民之道。叛徒卖国贼林彪同历史上所有没落阶级的代表一样，也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极力鼓吹反动的天才论，胡说“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孔孟之道的翻版，正好说明他是站在劳动人民对立面的反动派。我们要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就必须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大事，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发挥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直接关系到能不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去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会反映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也会反映到经济战线的各个领域。搞建设，搞农业，搞工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要同自然界作斗争，更要同阶级敌人，同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旧习惯，以及代表这些势力的错误路线作斗争。这种斗争是坚持什么方向、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紧紧地依靠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群众。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最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有了牢固的基础。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坚持这样做，取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时期，要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必须继续坚持这样做。正如党的十大文件所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



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是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这个方针建立在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基础之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只有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使这个方针得到落实。列宁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比历史上任何先进阶级都要高明得多，不仅有胆略、有力量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有志气、有能力建设一个新世界。“自力更生，力在群众之中”，“依靠群众，力量无穷，脱离群众，一事无成”，这是许多同志的切身体会。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成了国家的主人的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的锻炼和学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为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这个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这个伟大的源泉挖掘出来，就能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建立起独立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

有的人看不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把发展生产的着眼点放在进口外国的技术、设备方面，这是被批判过的洋奴哲学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反映，它的错误在于见物不见人，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否定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群众的创造力。这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在生产诸因素中，生产工具固然重要，但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任何生产工具都是由人创造和使用的。外国的机器设备和技术是怎么来的？不也是劳动群众创造发明的吗？“**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广大群众说得好：“不怕没机器，只怕没志气，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是最可宝贵的。有了这种志气，就不会在困难面前垂头丧气，也不会西方资产阶级面前卑躬屈膝。我们开发大庆油田，并且做到石油自给有余，并不是因为进口了多少机器，而是因为党的领导下，激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志气。许多赶上和超过世界



先进水平的发明创造，也是发挥广大群众创造性的结果。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有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不断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志气，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在**洋为中用**方针的指引下，正确地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就能够造出更多更好的机器设备，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做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有的，我们有；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没有的，我们也有。

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农业生产，根本的一条是要发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有了这一条，不仅物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即使物质条件较差，实际困难较多，也可以依靠群众的干劲和智慧，想出各种办法来，使困难局面转化为顺利局面，使生产得到发展。湖南省发展小化肥生产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看不到群众的力量，到依靠群众的过程。过去，这个省的化肥大部分靠国家调给。能不能改变这种状态呢？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有的同志看物质方面的困难多，看群众的积极性少，迟迟不能动手。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在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指引下，决心不吃现成饭，不当伸手派，积极要求自己动手办化肥。群众促进了干部，干部起来发动群众。没有设备，就用土办法解决问题，技术力量缺，就边干边学，群策群力，通过组织会战，开展协作，终于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了八十多个小氮肥厂和一些磷肥厂，使全省化肥自给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事实告诉我们，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虽然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去强求生产建设的胜利，但是在一定条件的限度内，只要遵循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却可以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有的单位，设备也是好设备，技术力量也不差，可是生产的步子却迈得不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那儿的群众没有积极性吗？不是的。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问题是要善于从本质上去发现这种积极性，通过政治思想工作去调动这种积极性。无论怎样落后的单位，都不是铁板一块，死水一潭，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广大群众对落后状况总是不满的，总是要起来革命的。这是本质和主流。所谓落后单位，并不是那儿的群众落后，而是那儿的**工作落后**，没有很好地发动群众，揭露矛盾，



开展斗争，积极地正确地引导群众前进。“面貌变不变，关键在路线。”只要领导深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交给群众，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就能抓住问题的症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取得抓革命、促生产的胜利。

领导者的责任，不仅要看到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要善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曾经指出：“**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就要求我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好政治思想工作。要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讨论国家大事，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根本上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群众的觉悟提高了，眼界扩大了，就能把本职工作同阶级的利益、革命的全局联系起来，为革命做工，为革命种田，为革命而工作，就会自觉自愿地为实现革命的总目标和党的各项任务而坚持不懈地奋斗。湖南益阳地区裕民煤矿坚持经常向广大群众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调动了广大群众为革命产煤的积极性。一九七〇年以来在超过设计能力的情况下，仍然连年增产，一九七三年的产量达到设计能力的两倍以上。许多这样的事实都生动地说明，只有坚持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抓好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做到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才能使广大群众振奋起革命精神，焕发出冲天的革命干劲。

一提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有的人就想到奖金。到底是靠政治思想工作还是靠物质奖励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反映了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为了毒化人们的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极力鼓吹物质刺激那一套，无耻地污蔑群众想“多搞点钱”。在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单位搞这个奖、那个奖，五花八门，评个不停。结果呢，钱发得越多，奖评得越多，带来的矛盾和麻烦也越多。不仅没有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反而使社会主义企业走上了斜路。这个历史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还不值得记取吗？那种所谓“花几个钱，能发展生产，划得来”的论调，值得大家驳一驳。所谓划得来划不来，不能看一时，而要看长远，不能光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靠奖金刺激起来的不



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能“积极”一时，不能坚持长久。我们要继续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黑货，同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我们也要关心群众生活，反对少数人的不正之风。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使群众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昂，才能使精神变物质，不断创造出精神和物质的成果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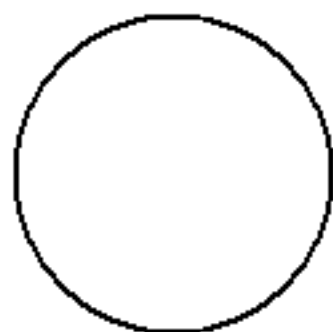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的正常进行，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但是，规章制度的产生和实施都必须通过群众。只有发动群众从实践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合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要求的规章制度才是合理的；只有使群众认识合理的规章制度的重要性，才能把它们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种规章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企图不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而单纯依赖规章制度，通过行政手段，简单地规定几条，要群众照章办事，甚至把它当作对付群众的“紧箍咒”，那就非但不能发挥它的作用，相反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斩断了束缚群众手脚的无形绳索，群众自己起来根据革命和生产的需要，逐步制订出一些比较合理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得到广阔的发挥，技术革新的鲜花到处盛开，新技术、新产品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和放松政治思想工作。

从根本上说，政治思想工作，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党的基本路线，去回答、解决人们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工作有没有成效，就看对问题回答得对不对，解决得透不透。这就需要我们善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道理。有的人因为做了一两次思想工作收效不大，就埋怨政治思想工作不灵，这是错误的。不是政治思想工作不灵，而是思想路线不正确，工作方法不对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对的，问题是要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只要我们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又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在想什么，抓住了思想战线上的关键问题，并且实行以理服人的方法，有分析有研究地摆事实讲道理，不搞大帽子压人，善于“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那么这样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没有什么不灵的，就能够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到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勤俭种田 越种越甜

——湖北崇阳县后溪大队的调查报告



崇阳县后溪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集体经济日益巩固壮大。一九七〇年以来，特别是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以来，这个大队在连续三年粮食超《纲要》的基础上，去年又战胜洪水灾害，夺得了丰收；粮食亩产跨过了千斤，生产成本不断下降，集体储备粮和公共积累增多，社员收入普遍增加。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抓住路线，面貌大变；勤俭种田，越种越甜。”

后溪大队生产条件较差，前山靠后山，九垄十八冲，粮食产量一直比较低。人民公社化以来，这个大队的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奋发图强，发扬“穷棒子”精神，带领群众，勤劳苦干，初步改变了贫穷面貌。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后溪大队一度出现了一股大手大脚、铺张浪费、不讲实效、搞形式主义的歪风，冲击了勤俭办社的方针，破坏了艰苦奋斗的传统。有的队不搞积肥，禾苗长得不好，就突击施化肥，扩大开支，还减了产。还有的队资本主义泛滥，把集体的钱挪用搞贩卖，修房盖屋，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损害了集体经济。

通过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后溪大队党支部认识到：勤俭办社，事关路线。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不仅是增产几斤粮、节省几个钱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能否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勤俭节约还是铺张浪费，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反映。因此，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必须抓



好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联系实际，运用典型，经常对社员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

一九七三年，他们提出了大干苦干，粮食亩产突破千斤关的要求。这时，有的人说：“本大利大。要想产量高，就得多花钱。”也有的说：“集体钱多，只要舍得，多买点化肥，就解决问题。”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的教导，发动群众围绕“夺高产要不要降低成本”的问题开展讨论，并运用四队和七队的事例进行对比分析。这两个队一个粮食产量高，成本低；一个粮食产量低，成本高。事实说明：成本高不一定有高产量，高产量不一定要高成本；夺高产主要是靠群众的积极性，靠艰苦奋斗，科学种田。通过学习讨论，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勤俭办社的自觉性。一九七三年第四生产队更上一层楼，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七十斤，生产成本继续下降。第七生产队也赶了上来，亩产达八百八十斤，成本也降了下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群众认清了勤俭办社的重大意义，树立了艰苦创业的思想，许多勤俭夺高产的办法就出来了，许多困难就得到了顺利解决。在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这个大队共修小型水库和塘堰三十二处。开始修第一个水库时，有的人想靠国家投资，后来大家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没有钱买雷管、炸药，就自己动脑筋制作；没有水泥，就用石灰、沙子、黄泥做成三合土代替；没有涵管，就自己烧砖来砌。这样，群策群力，苦战几个冬春，全大队的水利建设搞起来了，初步改变了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过去，这个大队添置农具都是花钱买，有的农具坏了，就到外地请人来修理，这样既增加支出，又影响使用。近几年来，他们坚持自造自修为主，还培训了十五名铁匠、木匠、篾匠，实行亦工亦农，就地修造。同时加强农具管理，做到勤收捡、勤保养、勤修理，延长了使用时间。

办农业，大的方面要节约，小的方面也不能忽略。比如，买一条犁盘绳或牛绳只几角钱，看起来花钱不多，其实积少成多，过去，第四生产队买这些东西，每年都要花八十多元。去年，他们所需要的犁盘绳是上山割的藤子，只用了两个



工；所需要的牛绳也是自己搓的，只花了七元钱买龙须草，一年就节约了七十多元。仅这两项不引人注意的开支，全大队就可节省五百多元。

坚持勤俭办社，关键在于干部自觉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五个委员，有四个是长工出身。几年来，他们经常忆苦思甜，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计划，办事情，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出发，不讲排场，不摆阔气，尽量压缩非生产性开支，不乱花一分钱。大队办公室是借的一间房子，办公用品很简单。这个大队离县城二十多里，交通方便，干部到县城开会或因公出差，总是步行，没有在队里报销过一张车票。有人问，为什么不搭车？他们说，社员进城积肥，都是步行来去，我们上县城开会，为什么不能步行？大队按规定提成的行政管理费，年年有节余。

这个大队干部以勤劳俭朴、廉洁奉公为荣。大队七个主要干部，几年来平均每人每年参加集体劳动二百四十天以上。干部劳动上带头，生活上也不搞特殊化。有一次，党支部书记的两个小孩病了，队里干部见他有困难，借十元公款帮助他。他说：“借支十元钱要经过群众讨论，这是我和社员一起订的财务制度，我们当干部的不能特殊。”全大队党员、干部五十六人，除两人家口多、确有困难，有点超支外，其余五十四人没有超支、挪用队里一分钱。

党支部还依靠群众，实行民主理财。他们坚持每月集中生产队会计清理账目、审查开支，及时张榜公布，自觉接受群众的检查和监督，严格财务制度；经常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拒腐蚀、永不沾的思想教育和遵守财务纪律的教育，及时纠正不正之风。大家说：“社员创造的集体财富，我们一分一厘不能挪用浪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我们每时每刻都要警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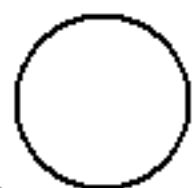
干部带头勤俭办社，教育和带动了群众。大家丰收不忘节约，富日子当穷日子过。遵照毛主席关于“广积粮”的教导，坚持年年节约一点，多卖一点，储备一点。一九七〇年以来，除完成征购任务外，卖给国家超产粮十八万斤，集体储粮十五万斤，社员储粮八万斤。

中国共产党崇阳县委员会调查组



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洪 城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革命纪律。后来，经过发展和补充，一九四七年十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四十多年来，在我军的发展史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它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加强军民、军政、官兵之间的团结，瓦解敌军、壮大自己，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今天，我军担负着对内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的新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按照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进一步加强军队建设，继续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高度统一，步调一致，为反修防修、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在我军建军之初，毛主席就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一九四五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论述人民军队的宗旨时，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毛主席亲自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这条路线，明确规定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军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广大指战员的头脑，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等。毛主席所制定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是我军的生命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条建军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订，生动地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由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就决定了它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和统一指挥，执行严格的纪律；由于这个军队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就决定了它必须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正确处理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正确执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和执行，就可以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大大推进一步。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正因为纪律对于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十分重要，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反对党的正确路线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制订和执行过程，就充满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激烈斗争。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中，阐明了建设人民军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批判和纠正了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几十年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是我军广大指战员的行动准则，在长期的执行过程中，已经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从工农红军发展到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尽管这支部队在人员、环境、编制、装备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却作为革命的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不断发扬光大。经过全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实践和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全国人民中间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他们学习人民解放军好传统、好作风的一个重要内容。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疯狂地破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军历来的光荣传统。但是，林彪却炮制了一个反动透顶的缔造者不能指挥的谬论，阴谋搞反革命政变。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策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间，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并特别强调要记清和执行三大纪律第一条，八项注意第一条、第五条。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有力地鼓舞和指引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斗争。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他们的罪恶活动被彻底揭露。林彪妄图“**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只落得个投敌叛国、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我们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为



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彻底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当前最重要的是抓好批林批孔。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是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纲。同时，我们要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我军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样，才能更好地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条条要执行。首先要牢记和执行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一条最要紧。

“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要贯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毛主席指出：“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必须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战争和战略问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切行动听从党的指挥，才能做到一切行动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任何背离党的领导、不听党的指挥的行动，都将极大地危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导致对于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破坏。

我党我军半个世纪以来的战斗历程证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领导，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也就是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听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听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挥。毛主席、党中央指向那里，就战斗到那里；赋予什么任务，就坚决完成什么任务。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可南可北，可东可西。只要全军上下步调一致，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八项注意，首先要牢记和执行第一条、第五条，即“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这就是说，对战士，对下级，对人民态度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坚决克服军阀作风。这两条讲的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处理好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的大问题。毛主席说：“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论持久战》）只有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才能有效地做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处理官兵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树立尊重士兵的观念。官长必须爱护士兵，把战士看作阶级兄弟，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待战士、对待下级。要采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处理和解决问题，而决不允许采用命令主义的、压服的方法。要认真听取来自战士和下级的批评建议，虚心接受他们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

处理军民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树立尊重人民的观念。军队必须爱护人民，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使军队在人民的眼里看成是自己的军队。我们军队来自人民，受人民群众哺育，如果不尊重人民，瞧不起人民，就是忘本。我们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如果我们对为之服务的对象都不尊重，自以为高于人民一等，怎么能谈得上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以至不惜流血牺牲呢？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无论是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还是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我们取得胜利的決定因素之一，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充分支持和配合。因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解决尊重人民这个根本的态度问题。军爱民，民拥军，军队和人民群众真正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会被我们所压倒。

打人骂人的军阀作风，是国民党作风，严重违背我军的宗旨。军阀作风是剥削阶级军队的特征之一。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压迫人民，他们的纪律只能靠打骂来维持。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根本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纪律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在军队内部，无论是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还是在军队和人民之间，都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这是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政治基础。如果我们的同志不以平等待人的态度来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势必违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脱离群众，使自己处于同群众相对立的地位。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十分重要。我军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是党的路线、政策的执行者，而且是带领群众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政策的组织者，他们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广大群众的行动。领导干部自觉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下级，为战士，为群众做出了榜样，就会在本地区、本部门形成人人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生动局面。

让我们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歌曲，深入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斗争，满怀信心地去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锄 毒 草 化 肥 料

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

——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人民日报》评论员

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抱有不同的态度。亿万革命人民和广大国际朋友表示赞扬和同情，而一小撮反动势力则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一种现象。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



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一)

影片摄制者在解说词中说，他“不打算评论中国，而只想开始观察中国的各种面目、姿态和习惯”。这完全是骗人的。这个所谓“纪录片”，每一个镜头都有评论，这是借用反动艺术手法污蔑和丑化中国的极其恶毒的政治评论，是肆无忌惮地公开露骨地反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评论。

影片的镜头从北京天安门开始，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其实，这种安排却是为整个“纪录片”的反动主题服务的。影片说，“北京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中心”，“人民共和国就在天安门宣告成立”，“文化革命的红卫兵浪潮也在这里兴起”。然后，影片“离开天安门”，带领观众开始“观察”中国，也就是要人们看看中国革命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接着就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象样子。影片的这种结构和布局，纯粹是为了把攻击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咒骂革命，否定革命，反对革命，就是这部影片的要害所在。

反动影片《中国》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安东尼奥尼把上海作为“工业化的大城市”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大肆炫耀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功劳”，竭力贬低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伟大成就吗？影片中还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拍了一些丑



化劳动人民的镜头。作者的险恶用心是要暗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岂不可想而知！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安东尼奥尼还恶狠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

这部影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诋毁和污蔑是多方面的。从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从文化教育到体育运动，从医疗卫生到计划生育，以至幼儿园，统统不放过。

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化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子“今天成了办公楼”。

影片竭力否认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说什么“北京人是贫穷的，但并不悲惨”。承蒙这位导演先生手下留情，还说我们不算悲惨；但他的真意是嘲笑我们“贫穷”。他不是在城市和乡村拚命捕捉一些镜头，攻击人们“衣服破旧”，“劳动繁重”，诬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遇到“穷人”吗？所有这些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老爷的腔调！

安东尼奥尼所以把解放后的中国描绘成这样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非是要人们得出中国不应当进行革命的反动结论。他攻击人民公社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已剩下“寥寥无几”，甚至借用打太极拳的镜头，造谣说“新的领导人”要“取消”这一“古老的传统”。总之，在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动分子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中国的革命搞糟了，只有倒退，只有复旧，才有出路。这就充分暴露了挂着“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二)

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他企图通过影片制造这样的假象，似乎中国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地位，没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解放，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没有热情的。

全世界都看到，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在我们的国家，“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是，安东尼奥尼却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好吃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洲人的自傲”的架子，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

更刻毒的是，安东尼奥尼还用拐弯抹角的语言、含沙射影的手法来向观众暗示，中国人民的精神是受压抑的，心情是不舒畅的，对现实是不满的。他在上海城隍庙茶楼的画面中插入了一句不怀好意的旁白：“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忠于现在”不过是一句反话，实际上是要诬蔑中国人民对新社会的拥护是出于被迫的，并非真心实意。安东尼奥尼不是在影片中一再渲染中国人民是不自由的吗？他公然嘲讽工人讨论会的发言“重复而单调”，“不是一个真正的讨论会”，诬蔑中国儿童高唱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治性”歌曲同他们的天真可爱不相容，因而并非发自内心。他还胡说由于人们的“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是有着不满现实的莫大“痛苦”的，只是不敢表达出来而已。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局面生动活泼，广大人民享受着真正的民主，心情无比舒畅。安东尼奥尼企图钻空子，煽动中国人民



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只能是枉费心机。感到“痛苦”的则是一小撮妄想在中国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至于说什么中国人民“想念过去”，这更是污蔑。什么人“想念过去”？中国人民对百年魔怪舞翩跹的“过去”，是深恶痛绝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才念念不忘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朝朝夕夕梦想使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拉不回来的，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碎！

(三)

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所采用的手法，也是极端反动和卑劣的。

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而他认为可以用来污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则又是全景，又是特写，不厌其冗长。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象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在影片的剪接上，画面跳来跳去，好象是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片段的衔接，都是恶意安排的。比如，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象，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影片在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很坏的。影片的大部分都以灰暗的光线和阴冷的色调拍摄。黄浦江象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



村阴影重重。总之，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尤其恶劣的是，影片摄制者还利用配乐作为进行诽谤的手段。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据有关单位揭露，这种剪接完完全全是伪造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真是恶毒透顶！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这从他在中国的拍摄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在解说词中公开宣扬有很多镜头是象间谍那样偷拍的。他得意地说，他在黄浦江如何“冲破禁令偷偷地拍摄了”中国军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如何“把摄影机掩盖住”，“冷不防地抢摄这里的生活场面”。他还埋怨说“带着摄影机在前门大街那里行走是不方便的”。什么不方便？就是做贼不方便。更有甚者，他为了炮制污辱中国人民的镜头，在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竟然要别人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让他拍摄；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要群众按照他的口味改换服装，否则拒绝拍摄。他的这种偷拍、强摄、作假的行径，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尊重和藐视。

(四)

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它的国际背景的。

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是国际上反华的急先锋和总后台。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人民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他们说，中国人穷得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新的破坏”；中国人民“疲困不堪”，处在“严重的苦难”之中，过着“兵营式的生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愚蠢的诽谤，只是暴露了苏修叛徒们的丑恶面目，



而没有使他们捞到任何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苏修的反华谎言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奥尼的反动影片披着“客观”、“真实”的外衣来欺世惑众，又把苏修这一套造谣诬蔑搬出来，妄图起苏修反华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安东尼奥尼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已经破产的苏修反华宣传的应声虫。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出笼之后，美国广播公司花了二十五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并在美国公开放映，还有人帮腔说这部反动影片是“吸引人的”。看来，杜勒斯的阴魂仍然附在一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身上，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出现，也适应了这些反动势力的需要。

安东尼奥尼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他决不能代表千百万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态度的意大利人民。反华，这是广大意大利人民决不会同意的。安东尼奥尼拍摄这样的反华影片，同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民要求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显然完全背道而驰。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互相了解。在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我们从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一再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从不隐讳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前进中的缺点，还有落后、反动的东西，需要继续革命。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欢迎各国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但是，谁要是冒充“朋友”而实际上却干着卑鄙的反华勾当，去博取极端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喝采，我们就要给予彻底揭露，以剥夺其招摇撞骗的资本。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告诉人们，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必须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世界上总有敌视中国人民的势力，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反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华的好汉，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管使用什么武器，玩弄什么手法，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 国际述评 ·

在所谓“能源危机”的背后

常 谦

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能源危机”。石油供应的短缺,使它们从生产到生活都受到了“石油震荡”的冲击。工厂因电力不足而关闭,汽车因缺少燃料而停开,室温降低,灯光不亮,物价随着油价迎风飞涨,股票行市则因经济前景不妙普遍下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也受到了“能源危机”的影响。“能源危机”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实经历着一个“最寒冷的冬天”。《红楼梦》中有“昏惨惨似灯将尽”之句,借用来刻画混乱黑暗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及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阴暗心情,是非常逼真的。

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国外的资产阶级报刊,有的把它说成是自然资源的原因,是什么“能源的枯竭”,有的则荒唐地把它归罪于阿拉伯人民使用了石油武器。这些说法或者回避要害,或者嫁祸于人,无非是故布迷阵,用以混淆视听而已。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前的“能源危机”主要表现为石油的供应不足。从现象上看起来,似乎是自然资源的问题,实际上根本不是。世界上包括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能源充裕得很,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可以用上千年。何况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人们正在发现并必将继续发现新的能源。资本主义世界的“能源危机”,从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反映,是资本帝国主义制度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垄断资本对国内外人民残酷剥削和疯狂掠夺造成的,在当前,又是美帝和苏修两个超级大国疯狂对外扩张和争霸世界的直接结果。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资本论》)追逐高额的垄断利润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对能源的开发,资本家考虑的不是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而是如何能攫取更多的利润。各种能源的消长变化,常常取决于利润的大小。以前,煤炭曾经是主要的动力来源,是“工业



的粮食”。至今煤炭的蕴藏量仍然丰富得很。但是，煤炭工业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已普遍衰落了。即使在煤炭蕴藏量最大的美国，它在能源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现在也仅占五分之一。原因是从获取利润的角度来看，采煤远不如采油划算，因而得不到资本家的青睐。从油页岩、油砂中也可提炼石油。目前世界已知油页岩和油砂的含油量，要比石油的蕴藏量高出好几倍。但也由于不如直接开采石油的利润高，满足不了资本家的贪欲，同样受到了资本家的冷遇，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资本主义就是浪费。在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生活上的穷奢极侈，都浪费着大量的石油。石油矿脉由于胡乱钻井而被破坏，油井由于拚命放油造成压力降低而开采不出来，如此等等，致使大量宝贵的石油白白弃之于地下。据估计，美国现在的石油回采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五，也就是说，每采出一吨石油，就废弃了两吨。至于使用上的挥霍浪费那就更加令人触目惊心了。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非生产用电已占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美国报刊也承认，美国的能源消耗有一半是浪费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疯狂扩军备战，到处发动侵略战争，更是消耗和浪费石油的无底洞。这就是为什么当世界上的能源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丰富而多样的时候，在号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竟会发生“能源危机”的根本原因。正象有的美国人所说：“这不能怪大自然母亲，而是怪山姆大叔。”

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掠夺。由于石油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由于到国外掠夺石油可以比在国内赚更多的钱，垄断资本家放着国内的石油不去开采，而蜂拥到第三世界去抢地劫油。他们特别看中了拥有丰富的石油宝藏和在政治上、地理上占着重要战略地位的中东。在已探明的世界石油蕴藏量中，中东占三分之二。那里油层浅，钻井成功率高，出油量大，加上廉价的劳动力，开采的成本极低。如在科威特开采一吨石油的成本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这样，中东石油就成了外国垄断资本掠夺暴利的摇钱树，中东成为帝国主义各国长期争夺的焦点。二次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石油资源的最大掠夺者。目前，有一半以上的中东石油生产被控制在美国垄断资本手中。一九七二年底美国在中东石油的私人直接投资累计为十八亿美元，而当年获取的利润竟达二十四亿美元，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一百三十，是其海外全部投资平均利润率的十倍。战后帝国主义一时的虚假繁荣，就是建立在掠夺第三世界人民资源和血汗的基础上。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样受着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也以很大的野心参加到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行列。它自己的石油资源有的尚且无力开采，要到西方国家去招徕和叩求投资，但对中东石油却早已垂涎三尺，拚命向中东渗透，与美国争夺



中东石油霸权。又是“军援”，又是“经援”，不惜工本，大下赌注。它大搞“军火换石油”、“机器换石油”的掠夺性买卖，并从投机倒把中，攫取高额利润。仅倒卖一个国家的天然气，苏修就赚到了百分之三百的惊人利润。苏修掠夺中东石油的奸诈手段，比起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长期以来石油问题上的真正受害者，是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产油国。拥有和提供大量石油资源的中小国家是不发达的穷国，而消耗它们提供的大量石油的国家却成了发达的富国。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正是这种不合理的状况，迫使第三世界产油国起来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而斗争。阿拉伯国家这次同仇敌忾，拿起石油武器，通过削减生产，提高油价，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这是美苏两霸在中东又勾结又争夺的直接结果。由于中东所处的战略地位和拥有的石油资源，两霸都必欲夺得中东。中东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石油问题，而石油问题又是和争夺世界霸权紧密联系着的。正如一家西方报刊所说：“谁占有石油，谁就控制世界，特别是控制靠东方提供石油的欧洲”。正由于此，两霸完全不顾阿拉伯人民的利益，长期在中东搞不战不和，支持和怂恿以色列的侵略。这种状况，逼得阿拉伯国家起来反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两霸再也不能完全控制中东局势和为所欲为地掠夺别国了，石油危机不过是反映了它们的霸权危机。

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在资本主义世界引起的震动，更加清楚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现在世界上究竟谁养活谁？过去，帝国主义者一直宣扬是它们养活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如果离开它们的“援助”，这些国家的人民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现在，石油斗争再次告诉人们，原来，离开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奴役和剥削，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才真是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它们完全是叮在发展中国家人民身上的寄生虫。它们的富，是掠夺来的富，而第三世界的穷，完全是被它们剥削和掠夺造成的。石油斗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民的觉悟，加强了人民的团结，这一点将会对各国人民的斗争产生深远的影响。

“能源危机”是当前天下大乱的一种表现。它又必然会使世界形势继续朝着动乱的方向变化。现在，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都在激化，特别是美苏两霸与各国人民的矛盾以及两霸之间的矛盾发展得更尖锐了。美苏在中东的争夺，剑拔弩张，愈演愈烈。它们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的。现在美国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所以大肆渲染“能源危机”，其目的除了在国内向人民开刀以转嫁危机牟取暴利之外，主要是对第三世界施加压力，加强与苏修的争夺，以维护在中东的既得利益。苏修为了与美国争霸中东，在对阿拉伯人民搞假支持真出卖的同时，则竭力散布所谓中东



石油“国际财产论”。它声称：“尽管阿拉伯石油在形式上是阿拉伯财产，但是实际上是国际财产”。显然，这一谬论的矛头针对着阿拉伯世界，宣扬帝国主义的“掠夺有理”。同时，它也指向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石油霸权，你不能独占，要“利益均沾”。这种帝国主义的论调，既说明了它是阿拉伯人民的凶恶敌人，又暴露了它继承老沙皇的衣钵，向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扩张的狂妄野心。但是，时代不同了，阿拉伯人民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已经拿起了石油武器和其他武器，为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生存权利而斗争。

至于西方所谓世界能源即将枯竭之说，则完全是没落阶级的杞人忧天。它们总是把自己的危机和灭亡，说成是世界末日的来临。物质不灭，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能源是无穷的，人类认识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也是无限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从钻木燧石的萤萤之火，到今天的煤炭、石油、原子能和太阳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但能源的种类在不断增加，就是各种能源的用途也在发展扩大。因此，在能源问题上的一切悲观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问题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能源的开发利用就和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先进的社会制度，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则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前进。就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吧。我国地大物博，蕴藏丰富，各种自然能源都有。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不仅掠夺走我国的大量宝贵能源，还给我们戴上“贫油国”的帽子。解放后的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自然能源不断涌现，不断开发。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过去完全依靠“洋油”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我国的石油不仅已能自给，而且还有出口。在能源的开发利用上，中国人民正谱写着崭新的篇章。

“能源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世界上决不会有什么“能源枯竭”，而只是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制度已经枯竭了，它的社会力量已经枯竭了”。（列宁：《今日俄国和工人运动》）它是帝国主义进一步走向没落的鲜明标志。不管资本主义世界的能源供求今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则是确定无疑、改变不了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世界正在动乱中前进。人民是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最伟大的动力。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终将埋葬万恶的造成各种危机的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人类一定会沿着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大道迅跑，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创造出今天甚至难以想象的奇迹来。

